

# 從振興工藝品 · 民藝啟蒙到生活文化振興

林承緯\*

## 摘要

回顧臺灣的工藝發展歷程，戰前 50 年可謂承先啟後的重要關鍵時期。然而，在面對這段歷史，過去多以殖民政權推行殖產興業、殖民化，在臺灣的工藝傳統置入產業機制，藉此經營達到資源剝奪、帝國獲利的終極目標來加以理解。一方面，因日治晚期的皇民化、同化等殖民政策的橫行，讓臺灣工藝發展遭打壓迫害的論調也頗為普遍。這些已成為論斷日治臺灣工藝發展的定論之見，近來隨著社會環境與民智漸開，在看待戰前時空的史觀有所轉變下，轉而以殖民當局雖側重經濟利益，但對產業發展造就的近代化進程予以評價。臺灣結束日本統治至今已七十餘年，只不過，造就現今臺灣工藝發展背後的產業環境、技術培育、產銷機制，甚至振興措施產銷機制，有相當的成份源自這段歷史。有鑑於至今為止，對日治時期工藝發展的研究深化仍有待開發，加上近期有相當的史料文獻彙整問世，以及論述工藝史知識體系也逐漸成熟。本論將運用日治臺灣工藝產業相關史料文獻，以工藝品振興、民藝啟蒙到生活文化振興三大工藝發展時序為軸心，重新探究日治臺灣工藝的發展始末。從山本鼎、國井喜太郎到柳宗悅等以農民美術、工藝指導、民藝運動活躍於日本的專家訪臺，促使臺灣總督府的產業政策在這些外來專家的指引下校正調整。日治臺灣工藝朝向振興之路的過程，在官也有民的推動引導間，透過展覽、銷售、座談、講習等振興措施，逐漸走出一條符合社會生態且貼近產業現實的工藝活路。

**關鍵詞：**臺灣工藝、柳宗悅、產業工藝、生活文化振興、日治時期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授兼文化資源學院院長。(lincwlab@gmail.com)

## 一、緒論

論及臺灣工藝有史以來的發展始末，相信肇始於19世紀末葉半世紀日本統治的影響不容小覷，但是當我們回顧近期關於臺灣工藝發展的論述，日治50年經常仍被有意無意地輕描淡寫帶過。〈臺灣地方工藝史的脈絡與意義〉一文分析近年臺灣工藝史研究史料運用的情形，曾針對前述的狀況提出：「一個是政治意識形態立場上所對歷史分析結果的影響力，另一個則是會刻意忽視日治時期的史料分析之跳空研究問題<sup>1</sup>」這兩點問題。認為日治工藝史方面的研究，常會出現「刻意尊崇中國漢式風格的工藝品，同時忽略日人統治時期的影響力的說法最為常見，尤其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的工藝史相關論文報告中最多。而相關說法則會形容成清代是中國式工藝品的崛起與發展成熟期，而日治

時期則因為多受壓抑，便備受殖民統治的打壓，因此而進入衰微時期等等的說法最為多見<sup>2</sup>」。這部分的研究詮釋，可理解為當時的時空背景及政治氛圍所限，更極端的情形是將日本領臺的50年歷史時空視為禁忌，或抱持著受欺壓剝削等刻板觀念來看待這段歷史<sup>3</sup>。譬如1992年刊登於《臺灣美術》的〈臺灣工藝的發展與變遷(上)〉，可謂綜觀臺灣工藝發展相當具代表性的論著，此文以「日據時代」為小標，說道「日人對臺灣的現代化改造是很有計畫和急進的，但對臺灣的中國傳統卻欲徹底地破壞剷除。為同化的目的，下了很大功夫。所以臺灣傳統工藝的發展遭到犧牲…」<sup>4</sup>。接續又指出1900年日本政府施行「市區改正」，以及其後的「南進基地」政策可說是影響臺灣工藝的關鍵。除此之外，更進一步以「在手工藝製作方面，從獎勵到控制，為南侵軍需

<sup>1</sup> 諸葛正，〈臺灣地方工藝史的脈絡與意義〉，《臺灣工藝》38，2010，頁10。

<sup>2</sup> 諸葛正，〈臺灣地方工藝史的脈絡與意義〉，《臺灣工藝》38，2010，頁10。

<sup>3</sup> 經濟史學者林文凱以日治時期經濟史的研究詮釋議題為例，說明以「帝國主義與殖民剝削論」史觀來詮釋日治臺灣所衍伸的問題，指出「戰前從矢內原忠雄到戰後周憲文、涂照彥與劉進慶等前輩學人，都採用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論觀點來解釋日治時期的經濟史，並主要從殖民性的面向關切殖民地人民所受到的經濟剝削。分析觀點主要從階級剝削與生產關係出發，關切國家的經濟政策與資本家對於臺灣農工勞動階級剩餘價值的剝削，較少關照生產力的面向，也不太正視日治時期臺灣的經濟成長與發展等經濟現代化問題。(中略)1990年代日本與臺灣學界的臺灣經濟史研究重新開展以來，隨著國際經濟學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退潮，新古典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等主流經濟典範的流行，以及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發展，過去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的經濟史分析觀點開始退潮。有關日治經濟史的解釋除了殖民性的一面，也開始強調近代化的面向，可以稱之為所謂殖民近代化論的主張開始出現」(參照自林文凱，〈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臺灣文獻》68：4，2017，頁119-120)。前述的情形也深刻反映於臺灣工藝史的詮釋之上，雖然近年來針對日治時期工藝的論述，開始出現強調產業化造就的近代化的發展面向，重新評價戰前的臺灣工藝發展。只不過，欠缺完整性的學術領域建構及延續性的研究議題深化等問題，都反映出臺灣工藝的學術性研究及知識建構猶待眾人大力耕耘。

<sup>4</sup> 江韶瑩，〈臺灣工藝的發展與變遷(上)〉，《臺灣美術》4：3，1992，頁30。

而變成軍需用品的供應據點，也是工藝品成為狹窄的大和民族浪漫主義之亞流」<sup>5</sup>敘說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臺灣工藝發展造成的影響。

該篇精要地描述日治時期臺灣工藝的狀態，認為漢人傳統工藝發展受同化等政策侷限甚至壓制，以及在地工藝於日方軍事需求下，雖然配合供給獲得獎勵等支持，卻也因此喪失臺灣工藝的傳統風格。最終以「急遽變化的時代，在國主義與殖民政策下，日本的有計畫和大量投資的做法奠定了臺灣現代工藝基礎」<sup>6</sup>來為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工藝作註腳。此文概略卻不失精要的內容描述，至今看來仍具學術價值及代表性，只不過時代氛圍導致的侷限及資料匱乏等問題，造成對日治臺灣的工藝發展敘說僅點到為止。所幸國內學界於這方面的困境，從九零年代中末葉開始，逐步有了些轉機。日治時期臺灣各項專題性研究的開展，從1999年以降，質與量皆有大幅的成長<sup>7</sup>。就以1949年創刊，至今已發行超過70年的人文研究期刊《臺灣文獻季刊》來說，在1999年前每隔

十年刊物各期收錄與日治時期臺灣歷史有關的論文總數僅在十篇上下。不過在2000年以後，幾乎每年都有十篇以上，如此的研究風氣延續至今<sup>8</sup>。另一方面，用詞上的改變也體現日治臺灣研究在近年來的轉變。過去以「日據」為題的研究書寫，逐步轉變為「日治」，反映出面對戰前的史觀有所改變，過往基於中華民國政府視日本為敵對國，也反映對甲午戰爭遭致臺灣割讓史實的理解詮釋，故以「日據」來定義那個時代，並採用竊據、佔領等用詞。

現今多半的研究前提多認同那段歷史乃依據國際法，「日治」一詞已成為目前最被學界接受的概念。戴寶村〈《臺灣文獻》與日治時代研究：研究史面向的考察〉針對這些現象展開研究，指出：「《臺灣文獻》的文章名中首次出現『日治時期』，已經是1997年的事，而且也只是零星的使用，2000年以後才較自然地使用『日治時期』而少見『日據時期』」<sup>9</sup>。如此的研究發展趨勢，幾乎也同步反映於對臺灣工藝歷史的研究之上。在1999年所刊登的〈臺灣民間工藝發

<sup>5</sup> 江韶瑩，〈臺灣工藝的發展與變遷 上〉，《臺灣美術》4：3，1992，頁31。

<sup>6</sup> 江韶瑩，〈臺灣工藝的發展與變遷 上〉，《臺灣美術》4：3，1992，頁31。

<sup>7</sup> 戴寶村，〈《臺灣文獻》與日治時代研究：研究史面向的考察〉指出：其一，為因日治時期史料絕大多數為日文，礙於語言的差異，部份無法閱讀日文的研究者，即使想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史亦有力不從心之感，導致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數量偏少；第二，過去日治時期臺灣史較不受學界與社會大眾重視，相關研究論文自然不受青睞，造成研究者少，乏人問津；第三，負責編輯規劃者的意向亦應有影響。

<sup>8</sup> 戴寶村，〈《臺灣文獻》與日治時代研究：研究史面向的考察〉，《臺灣文獻》59：2，2008，頁53-54。

<sup>9</sup> 戴寶村，〈《臺灣文獻》與日治時代研究：研究史面向的考察〉，《臺灣文獻》59：2，2008，頁56。

展史略〉一文中，「日據」一詞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日治」，雖然此篇論及到日治時期工藝發展實際的篇幅並不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揭文所用「破壞剷除」、「狹隘」等強烈批判性的字句也不在，轉而側重於強調殖民進程加速了手工產業的發展，同時也略提及柳宗悅來臺，以及臺灣總督府、日籍學者出版相關刊物及發掘工藝特色等事蹟。較為可惜的是，此篇行文論述雖呈現宏觀的視野，企圖勾勒臺灣工藝歷史的整體架構，但可能受限於議題設定及篇幅限制，對於戰前具體的工藝振興、造型文化論述等工藝論層次的探討仍未能觸及。

西元2004年，《臺灣工藝季刊》第19期呼應國立臺灣美術館正辦理的「威廉·莫里斯與工藝美術」特展，推出「威廉·莫里斯對臺灣工藝的意義特輯」，同時也將〈文建會主委陳其南－談傳統工藝與全民美學〉與〈2005臺灣生活工藝運動元年預告〉兩稿收錄其中，傳達名為「臺灣生活工藝運動」的工藝復興政策即將展開。同刊從第20期起一連刊登：〈從莫里斯、柳宗悅、顏水龍：生活工藝的先驅與生活工藝的振興〉、〈顏水龍的1940年代〉、〈柳宗悅與日本民藝〉、〈柳宗悅談民藝的宗旨〉以及〈柳宗悅與日本民藝運動－柳宗悅的生涯及其思想展開之軌跡〉等文。收錄其中的文章有學術性的研究發表，亦有譯自外國展覽圖錄及相關資訊的報導。在這波出自展覽與「2005臺灣

生活工藝運動元年」文化政策的落實，間接擾動停滯已久的臺灣工藝史論的研究議題。特別是過往僅能從顏水龍發表的文稿被介紹的柳宗悅，這位曾在戰前來臺進行工藝考察的日本民藝運動倡導者，藉由這一系列的曝光，成為現今國人們熟知的日本「工藝大師」。並且與威廉·莫里斯、顏水龍，被視為「2005臺灣生活工藝運動元年」重要的精神象徵。自此以來，這三號人物擠身成論述臺灣工藝最熱門的核心人物，其中，特別是顏水龍(1903-1997)與柳宗悅(1889-1961)，被理解牽起臺灣、日本工藝脈絡的關鍵脈絡。藉由當時幾篇的文稿及「顏水龍與日本民藝展」、「顏水龍生活工藝思行展暨日本民藝展」等展示的推波助瀾，柳宗悅成為理解日治時期臺灣工藝不可忽視的存在，甚至1943年來臺探訪那段史話，更被視為鏈結臺灣與日本工藝發展的重要途徑。

日治時期臺灣工藝帶給人們的印象，除了宛如定論般的殖民政府厲行產業化措施，那位曾來臺考察民藝，啟迪顏水龍<sup>10</sup>等人推動工藝相關振興活動的柳宗悅<sup>11</sup>，加被視為探究日治臺灣工藝發展不可忽視的要件。然而，這段影響臺灣工藝發展深遠的日治時期，除了臺灣總督府殖產興業氣焰下的產業化推動，以及柳宗悅來臺與對顏水龍工藝振興志業加諸的影響。50年間的臺灣工藝與造型文化發展脈絡，是否還有什麼被錯過的輝煌事蹟、關鍵人物或是重要論述，因過去的總總因素被吞噬於歷史洪

流中，導致日治臺灣工藝史的研究成果相對顯得薄弱。2011年，適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所發表的〈中華民國工藝史〉<sup>12</sup>，該文以通論性的視野來敘說臺灣工藝百年來的發展全貌，在闡述「日治時期」五十年來工藝發展的篇幅中，全面地引用1943年顏水龍刊登於《工藝NEWS》的〈關於臺灣的工藝產業〉<sup>13</sup>來做為章節內容，並未進一步對日治時期臺灣工藝再加以詮釋。如此的作法令人不禁要問，日治時期臺灣工藝發展的樣貌僅仰賴顏水龍當年的調查所見，是否足以展現這個特別時代的工藝全貌？特別是隨著學術研究議題的拓展，以及戰前各項研究資料的再出土，都足以提供今日加速來重建、補完「臺灣工藝史」。藉此，本論將乘著這一波再探臺灣工藝發展始末的軌跡，透過更細緻的戰前相關史料資料發掘及重讀探究，延伸過往僅止於點狀，單面向對日治工藝發展樣貌的探索基礎，再進一步透過關鍵的人

物、組織及其事蹟作為再探歷史的線索，增補且還原臺灣工藝發展重要時代的歷史原貌。

## 二、從民藝發見回首家內工業振興、工藝品趣味論的時代

「榮耀世界的竹細工製品

要好好保存臺灣民藝

於鐵路飯店舉行圍著柳氏的臺灣民藝座談會<sup>14</sup>」

<sup>10</sup> 本論為聚焦於研究議題設定，同時也受限於版面及篇幅，故對於近年已陸續有較成熟研究成果問世的顏水龍於日治時期工藝振興的討論即割愛不多贅述，相關研究可參照：臺北市立美術館編，《走進公眾美化臺灣：顏水龍》，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12；顏水龍，《臺灣工藝》（再版），南投：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2016；林承緯，〈顏水龍的臺灣工藝復興運動與柳宗悅——生活工藝運動之比較研究〉，《藝術評論》18，2008，頁167-195；陳以凡，〈日治末期臺灣的工藝論述——《民俗臺灣》、柳宗悅與顏水龍〉，《現代美術雙月刊》160，2012，頁70-81等著作。

<sup>11</sup> 2021年正逢柳宗悅逝世六十週年，1952年開館被柳宗悅撰寫〈近代美術館と民藝館〉（《民藝》64）一文批判忽視工藝價值的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隆重辦理「柳宗悅沒後60年記念展『民藝の100年』」展覽，在這座日本代表性的美術展覽場域，展示柳宗悅一生致力的民藝運動及獨特的美學思想詮釋，其意義重大且深遠。（參照：展覽官方網站 <https://mingei100.jp/>）

<sup>12</sup> 翁徐得，〈中華民國工藝史〉，《中華民國發展史——教育與文化（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

<sup>13</sup> 顏水龍，〈臺灣の工藝産業に就いて〉，《工藝ニュース》12：5，1943，頁170-177。

<sup>14</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4月16日，3版。

西元 1943 年 4 月 14 日，風塵僕僕歷時一個多月，完成臺灣全島民藝考察的柳宗悅，在踏上歸途前夕短暫駐足臺北，出席雜誌《臺灣公論》策劃的「生活與民藝座談會」<sup>15</sup>，也來到臺灣第一學府臺北帝國大學進行演講。該日，應臺灣總督府文教局之邀，於鐵路飯店辦理的臺灣民藝座談會上分享此行見聞所感。這場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主辦的座談會，是此行官方色彩最濃厚的一場公開活動。《臺灣日日新報》以前揭的文字為這場座談下標題，用詞及語氣應取自柳宗悅真誠帶著直率的口吻，呼籲要保存臺灣民藝，就像他當年為了朝鮮半島的民藝，以及日本列島上的日常生活器物所奔走那般。在這場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長主持，眾多在臺官員雅士出席的場合，柳宗悅將在臺灣各地所蒐集的竹編器、陶器及原住民織品一一陳列於會場，娓娓道出他半輩子從早期為探索象形文化而遠渡朝鮮、滿州，到這次前來臺的民藝見聞及其感受。舉凡以士林刀作為臺灣名產的話題，或是談到臺灣民居正廳中的神桌，都讓柳宗悅流露出興致盎然的神情。就在座談落幕前，柳宗悅對臺灣工藝發展具體提出三點建言<sup>16</sup>：

1. 在日本及朝鮮論及保存傳統的作品，就會為這些作品製作目錄，將它視為美的事物來做保存。臺灣的話，例如臺南的孔廟等需被保護的建築物及林家花園的庭園等，也希望納入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加以保護。對於歷史較短的臺灣來說，這部分必須被保存而不受到破壞。
  2. 希望設置能展示這塊土地所孕育而生的有價值且獨特事物的場所，期待在各州廳都能夠一一來設置。看了臺東的鄉土館令人印象深刻。原住民的事物與漢人的事物都希望能夠被陳列展示。
  3. 希望展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工藝展覽會能向美術展覽會那樣每年辦理，展覽所陳列的不能是個人作家之作，期待是一場生活藝術的工藝展。如果能夠成事將領先日本本土。要展示的，不是用來欣賞的事物，而是與日本生活有關係的作品，例如德國的鄉土工藝品就陳列於小學之中。
- 尊重在地歷史及傳統的事物，期盼將這些納入保存延續的主張，從柳宗悅 1922 年發表〈即將逝去，為了朝鮮建築〉<sup>17</sup>一文對朝鮮總督府欲拆除光化門表示抗議，或是為沖繩方言的保存出

<sup>15</sup> 柳宗悅・金關丈夫・大倉三郎・中村哲・立石鐵臣，〈生活と民藝座談会 — 柳宗悦氏を囲んで —〉，《臺灣公論》8：6，1943，頁 53-71。

<sup>16</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4 月 16 日，3 版；佚名，〈柳宗悦氏臺灣民藝視察談〉，《科學の臺灣》11：2，1943，頁 151。

<sup>17</sup> 柳宗悅，〈失われんとする、朝鮮建築のために〉，《改造》9 月號，1922；柳宗悅，《柳宗悦全集第六卷》，東京：筑摩書房，1981，頁 145-154。

力，不惜在 1940 年當時與沖繩縣當局論戰等作為。呼應柳宗悅為臺南孔廟、板橋林家花園保存傳世所抱持的關注，如此對文化保存秉持的信念及行動力，放諸現今仍合乎時宜。再者，他也提出具有價值與特色的事物，不僅須加以保存，更必要的是透過展示等作法讓眾人可以認識理解。這種運用展示來啟蒙社會及散播其民藝概念的做法，亦可上溯到當年在朝鮮創設的「朝鮮民藝美術館」，以及 1936 年創建於東京駒場的「日本民藝館」。定期做展示，著眼的是非個人性，是日常生活中為被使用而存在的，充分融入生活之中，非為了欣賞而存在的事物，正是柳宗悅畢生推行的民藝運動。柳宗悅於這段說明之中，暫且放下了「民藝」一詞，取得代之的是人們更可理解的生活、日常等用語。這三點柳宗悅所提出的建言，成為臺灣總督府當時籌畫生活文化振興會的發展基礎。

話說回來，在近年來這波對柳宗悅關注的熱潮興起前，多數涉及對日治晚期工藝發展的描述，經常會以當局配合時局策動思想意識性的皇民化運動，以

及物資生活面向的代用軍需發展為首要。直到近期隨著柳宗悅在 1943 年訪臺<sup>18</sup>，以及同期雜誌《民俗臺灣》對傳統工藝、民藝議題的報導，在該刊編輯同人金關丈夫、立石鐵臣、池田敏雄，以及逐漸嶄露頭角的顏水龍等人物相繼浮現中，讓 1940 年代工藝發展具有的時代意義翻轉般重新被看見。柳宗悅訪臺落幕不久，名為「生活文化振興會」的組織活動，在臺灣總督府的支持下，以倡導日常生活用品、新造型生活革新為志而成立。戰前五十年代的臺灣工藝發展，由臺灣總督府當局扮演絕對的主導角色似乎是不爭的事實，各項先前研究側重在日治時期從初期對宗教信仰、工藝曲藝等民間生活環節的寬鬆以對，中期則積極導入產業機制，對技術、材料、組織、類項等採取政策性的經營控管，到了晚期則因應戰爭時局政策及皇民化運動的推波助瀾，緊縮或僅發展有利於國策推動的工藝產業。然後對照近年來，從威廉·莫里斯、柳宗悅到顏水龍的「2005 臺灣生活工藝運動元年」論點，在對照 1943 年日本民藝運動倡導者柳宗悅來臺後所留下的直接或間接性

<sup>18</sup>關於 1943 年柳宗悅一行訪臺進行生活工藝調查的詳細介紹，以及來臺考察蒐集衍生的各種討論及民藝對於臺灣社會的啟蒙影響等討論，受限於篇幅，在本論中並無法進行完成的說明。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可參照拙作：林承緯，〈柳宗悅與臺灣民藝〉，《文資學報》2，2006，頁 71-88；林承緯，〈臺灣における民芸運動の受容〉，《近代工藝運動とデザイン》（デザイン史フォーラム編），京都：思文閣出版社，2008；阿部純一郎，〈戦時下臺灣における三つの「地方文化」構想—『民俗臺灣』と日本民芸協会の民芸保存活動を事例として—〉，《ソシオロジ》54；2，2009，頁 71-88；天野朗子，〈臺灣の工藝と柳宗悦—柳宗悦の臺灣調査〉，《民芸》737，頁 6-15；角南聰一郎，〈民芸運動と臺灣原住民の工藝—学説史及び集積された資料の整理に向けて—〉，《人類学研究所 研究論集》2，2015，頁 69-80 等。

的影響，凸顯戰前工藝發展就當局政策性勵行推展之外，歷年來這些遠道而來的專家，被奉為救星般從內地禮聘來臺指導，或針對臺灣工藝振興相關課題，加以倡導、建言、批評、論述等人物存在的重要性不可忽視。

西元1922年，一場以「家內工業品展覽會」為名的展覽盛事在臺北隆重登場，這場展覽會嚴格來說並非戰前最早以工藝為名的展覽，但若以整體規模與參與人數而論，絕對可理解為日治時期工藝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大展。「家內工業品展覽會」的辦理，被視為臺灣勸業共進會的遺緒，1916年，臺灣總督府為慶祝始政二十周年，宣揚在臺治績而盛大舉行的這場大博覽會，第一會場位於臺灣總督府廳舍，第二會場則設在臺北苗圃，也就是現今的植物園一帶。當時建設於臺北苗圃內的迎賓館，在展覽結束後被改為臺灣總督府商品陳列館官舍之用，這些設施在「家內工業品展覽會<sup>19</sup>」期間更被作為主展場所用。事實上，從臺灣總督府商品陳列館成立以來，曾在1917年及1920年，承辦過臺灣工藝品展覽會<sup>20</sup>、臺灣生產品展覽會<sup>21</sup>等展覽，只不過這些展覽會所發揮的成

效及指標性遠不如「家內工業品展覽會」。如此運用展覽策畫以落實工藝振興的措施，可追溯到1912年農商務大臣牧野顯伸針對工藝的進步及改良方案等問題，向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校長手島精一與圖案科科長松岡壽等人諮詢下所彙整的構想<sup>22</sup>。當年這項計畫共細分成三大項，第一是設置統籌工藝相關事務的政府機關，第二是籌辦工藝審查會議，聘請具權威性的專家擔任委員，針對工藝意匠等事宜進行審議研究，第三是開辦工藝品及意匠的展覽<sup>23</sup>。其中，隔年隨即籌辦的「第一回農商務省圖案及應用作品展示會」，實現了第三項的工藝進步及改良方案。這場以改善意匠圖案即提升應用作品進步為目的的展覽，自創辦以來引來日本國內工藝、圖案等領域者參展，1918年改名為農商務省工藝展，1925年再隨著機關組織改編更名為商工省工藝展，成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工藝展覽會。

對照日本本土這段工藝振興措施的推動歷程，在1920年代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開辦的「家內工業品展覽會」，以及在草創期推動的臺灣工藝品展覽會、臺灣生產品展覽會等相關展覽中，

<sup>1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06月04日，7版。

<sup>20</sup>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0月6日，7版。

<sup>21</sup> 佚名，〈本島狀況〉，《臺灣商品陳列館報 創刊號》，臺北：臺灣總督府商品陳列館，1927，頁21。

<sup>22</sup> 藤田治彥，《現代デザイン論》，京都：昭和堂，1999，頁38。

<sup>23</sup> 緒方康二，〈明治とデザイン——平山英三をめぐって〉，《デザイン理論》21，1982，頁37；東京高等工藝学校編，《松岡壽》，東京：松岡壽先生傳記編纂會，1941，頁59。

彷彿看到農商務省工藝展的影子。這些展覽皆由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商品陳列館籌畫，負責籌辦「家內工業品展覽會」的主任森忠平(1891-不詳)於開幕前夕，特以「本島家內工業與勞動」<sup>24</sup>為題，從歷史發展及族群性格等層面來剖析臺灣工藝的內涵發展。森忠平認為臺灣人移墾的時空背景與移民社會所呈現的開拓進取性格，反而導致工藝製作難以繁盛發達，癥結點在於臺灣人頻繁移動討生活的生存模式，阻礙了工藝的穩定發展。一方面，也透過閩籍、粵籍家庭對勞動的認知落差，以及各自的婦女在傳統社會被賦予的勞動分擔與纏足等傳統慣習等差異，論述臺灣工藝製作於各族群間的消長。這份對臺灣工藝發展的評估詮釋，跳脫一般多從材料、技術、產銷等基本層面來分析理解，藉由臺灣歷史發展特徵、族群慣習甚至是階級消費等角度來解析臺灣工藝，此舉反映森忠平對工藝產業的理解有獨到之處，其熱誠執著於事務推動的態度也在展覽會前後數度的言談中表露無遺。

堪稱臺灣首度的家內工業品展覽會，共吸引臺灣及日本本土 20 縣市出品，超過 3500 件工藝品的展示及銷售，顯示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推動這項展覽會抱持的強烈企圖，當時，日本政府農商務省也提供 262 件工藝參考品來臺參

展，間接呈現出中央主政機關對工藝產業振興及技術提升寄予的期待。這場展覽會配合明治天皇祭的日子，自 7 月 30 日起一連 20 天於商品展示館展售，會場一樓陳列有藤製品、竹細工、藤編提籃、農具類、土工品、草鞋、苧麻布、監獄製品、帽子等臺灣在地產品，並於牆面上透過照片來展示說明家內工業的現況。展場二樓則展出日本本地 20 縣市的特色物品，還有臺灣在地的原住民工藝及學生製品等。不論臺灣在地或從日本送來的展品，除了部分非賣品之外都提供現場銷售或訂購，品項豐富多樣的展品及低於市售價格等條件<sup>25</sup>，從開幕即吸引大量民眾前來看展採購。熱絡的人潮買氣加上會場周邊以 50 盞百燭光打造的廣告塔妝點氣氛，盛況空前的展覽會氛圍，在首日就吸引將近兩萬人觀展。不論是來自日本本地的蛇目傘、木屐鞋帶、博多絞り、花籠，還是臺灣在地出產的藤製提籃、藤椅及番布等品項皆被民眾搶購一空<sup>26</sup>，展現於看展人數及展品銷售的榮景，無疑是社會各界對這場展覽會所加諸的肯定。在眾多展示之中，來自花蓮港廳瑞穗公學校的展品，特別受到新聞媒體的報導關注。這所施行全住宿制的學校，由於校長中條福安對傳統工藝有興趣，曾自費前往日本各地進行工藝調查，進而仿效山本鼎

<sup>24</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07 月 27 日，3 版；《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07 月 28 日，3 版。

<sup>25</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07 月 30 日，7 版。

<sup>26</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08 月 01 日，7 版。

提倡的農民藝術及其作法，鼓勵該校學童利用課餘時間習藝製作，期許發展成

一種副業也帶有撫番等目的，還期盼藉此將原住民藝術廣為推廣<sup>27</sup>。



◆ 演實作製子帽の展業工內家 ◆

圖 1 家內工業展會上的帽子製作示範場景<sup>28</sup>

森忠平主任在展覽會落幕所發表的〈家內工業的振興策〉言談中，再度提及瑞穗公學校學生參展一事，認為該校仿效農民藝術理念來落實生活藝術化，這樣的構想及落實成效值得稱許。除此之外，以月桃、竹製品、苧麻來說明這些原料的特性及更理想的運用模式，認為臺灣的家內工業已相當的發達，銷售據點應是下一步該好好思考的<sup>29</sup>。對於家內工業與產業組合的關聯性，主張借助組合的組織力量將有助於工藝振興，並提示地方指導需親自至在地現場解各

地狀況，承辦者熱心此務者多半能獲得更佳的功效等。森忠平對臺灣家內工業熱切的發言及適時認定此刻為家內工業發展好機的判斷，似乎為1924年總督府聘請農民藝術推動者山本鼎來臺考察一事埋下伏筆。就在家內工業品展覽會落幕的一年後，一篇署名東京·後藤朝太郎的投稿〈應該如何指導啟發位在中國、日本兩種趣味間的臺灣工藝品的未來〉被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後藤朝太郎(1881-1945)為日本戰前著名的語言學者、中國通，曾任臺灣總督囑託，

<sup>27</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08月06日，7版。

<sup>28</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08月06日，7版。

<sup>2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08月23日，7版。

對中國工藝也有相當的造詣<sup>30</sup>，這篇投稿文章開宗明義提到「所有的工藝品是其產地的風俗、習慣、趣味、嗜好的表露，也因此，工藝品生產製作的狀況也就反映出當地的文化程度」。後藤朝太郎這段描述十足展現出視工藝等同於文化的認知，他憑藉著過往遊歷中國、滿州、朝鮮等地時對工藝製作的觀察，認為臺灣的工藝品就風格趣味上正好介於中國與日本間，他從用材與工資兩面來分析日本國內木工藝發展面臨的困境。除此之外，後藤朝太郎也指出臺灣的工藝發展有相當豐富的材料可作為後盾，同時在製作所需的工資上也比日本低廉，在這兩項優勢下應可充分發展出良好的工藝品。另一方面，再提到中國製作呈現的趣味嗜好與日本相異甚多，他在和平博覽會臺灣館上看到臺灣出展之作，是由受刑者所製作的，後藤朝太郎建議可再從日本本地聘請師傅前往指導提升製作的氣韻品味，臺灣工藝發展的未來將無可限量<sup>31</sup>。

### 三、農民藝術與產業工藝啟動的臺灣工藝振興

西元 1924 年 4 月 8 日，農民美術研究者山本鼎 (1882-1946) 搭船來臺，

於下榻的日之丸館娓娓說道此行目的：「我此行來臺是受臺灣總督府所委託，將針對臺灣的原住民族工藝進行視察，從中收集各種材料為臺灣日後發展產業美術提出具體的計劃。臺灣原住民製作的產品深具獨特的趣味，若以所謂的農民美術來看待將是相當有趣的。這類的事物像位於日本北部有愛奴族製作的素木雕，以及在日本南部的臺灣有馬來系原住民製作的物品。只不過，他們都欠缺作為產業的相關準備機關與獎勵機關，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在長野縣經營農民美術研究所，為農閒副業進行新工藝品的研究，至今已有五年，多少累積了經驗，希望發揮此經驗來視察臺灣工藝的家庭副業及手工教育的現況，再提出適應當地的可行方案<sup>32</sup>」，這段到訪臺灣展開考察前的自述，清楚將此行目的及山本鼎關注的議題作了交代。這段報導在《臺灣日日新報》刊登的兩天後，以「調查臺灣農民藝術」為題，再被漢文版收錄刊登<sup>33</sup>，顯示當時社會氛圍對這則新聞的重視。這位從大正中期到昭和初期致力於農民美術運動的推動者山本鼎，以賦予農民製作的技術並造就製作的愉悅為志，是以農村為場域所發起的工藝振興運動，如此的運動理想與 1920 年代前後的臺灣社會局勢相互

<sup>30</sup> 人事興信所編，《人事興信錄 第 12 版》，東京：人事興信所，1940，頁 109。

<sup>3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07 月 10 日，3 版。

<sup>3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04 月 10 日，7 版。

<sup>3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04 月 12 日，漢文 6 版。

吻合。特別是增進農民收入、創造副業機會、開發地方特產及緩和都市人口等具體目標<sup>34</sup>，在當時被視為農民美術運動預期創造的農村改革藍圖。山本鼎倡導農民美術開拓工藝新局的事蹟，透過開辦講習、辦理展覽、組織生產組合及刊物專文發表等作為，讓農民美術的名氣不僅在日本各地被世人熟知，就像1922年盛大在於臺北登場的家內工業展覽會，以學童製作的鉢皿受矚目的瑞穗公學校，獲得山本鼎農民美術運動啟發的中條校長，便獨自在東臺灣偏鄉之地開辦瑞穗公學校版的農民美術運動。

農民美術運動展現的影響力，也反映於殖產局商品展示館主任森忠平在家內工業展覽會後的談話，那段對於家內工業振興的言談，特別讚揚瑞穗公學校效法農民美術運動落實生活藝術化的作為。山本鼎前後兩度來臺，首次到訪的1924年正值農民美術運動如火如荼的發展時期，從1919年草擬〈日本農民美術建業之趣意書〉，1920年開辦農民美術講習女子部並企劃農民美術製作個展等活動，山本鼎倡導的農民美術運動在

日本社會嶄露頭角。1922年山本鼎開設日本農民美術研究所<sup>35</sup>，如此立足於農村偏鄉的農村美術運動，在1923年卻來到東京大都會的時尚重鎮銀座資生堂辦理農民美術展<sup>36</sup>，顯示農民美術運動的推動在當時廣受各界所重視。聲勢如日中天的山本鼎到訪臺灣，與其說是受臺灣總督府或農商務省的委託，在山本鼎訪臺期間舉行的展覽出版品《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商品陳列館 副產獎勵展覽會出品物說明書》<sup>37</sup>之中，便直指訪臺出自內田總督的慫恿，如此直截了當的描述，顯示臺灣總督府當局對提升臺灣工藝振興的積極主動。話說回來，仰賴正活躍於日本本土的專才，寄予透過這種外部力量來加速現況被突破，確實也屢屢出現於戰前工藝振興各階段的發展。對照1924年山本鼎來臺倡導農民美術運動的精神及策略，另一位在戰前末期訪臺掀起一股民藝效應的柳宗悅，相信在今日更為世人所熟知。

從4月中旬踏上臺灣這塊土地，山本鼎一路的視察蹤跡，陸續被報導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從4月11日時

<sup>34</sup> 山口真理・三橋俊雄・宮崎清，〈山本鼎の日本農民美術運動 — 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農村工藝振興の内発性に関する研究〉，《デザイン学研究》42：2，1995，頁57；佚名，〈農村工藝特集号〉，《帝国工藝》9：2，1935，頁36。

<sup>35</sup> 1921年12月4日《臺灣日日新報》根據東京特電以「山本鼎氏が中心となり日本農民美術學校の設立計畫＝富豪後援／十數萬」為標題，報導山本鼎籌辦本農民美術學校的訊息。

<sup>36</sup> 山口真理・三橋俊雄・宮崎清，〈山本鼎の日本農民美術運動 — 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農村工藝振興の内発性に関する研究〉，《デザイン学研究》42：2，1995，頁58。

<sup>37</sup>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商品陳列館副產獎勵展覽會出品物說明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商品陳列館，1924，頁130。這場展覽辦理的時間正配合山本鼎訪臺行程，除了在品項上出現農民美術，在這本說明書最後篇幅，還特別刊登山本鼎論農民美術的文稿。

任臺北師範學校教諭江間常吉以一介島民身分撰文投稿來歡迎山本鼎<sup>38</sup>，連日出現山本鼎到訪臺中<sup>39</sup>，來到安平、高雄<sup>40</sup>等地視察，在臺中、新竹、臺北針對農民美術與圖畫教育進行演講等報導<sup>41</sup>。在一路上眾多講演中，就是5月5日午後，殖產局在臺灣總督府食堂辦理的「有望之臺灣工藝的產業」這場是針對臺灣視察成果的總結報告<sup>42</sup>，對往後臺灣工藝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特別是這場講演內容在會後轉成文字稿，從5月10日起共分成8篇，全文被連載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除此之外，5月20日起將譯成漢文的內容，以〈有望之臺灣工藝的產業〉為題，再度轉載於《臺灣日日新報》。這篇結構完整且篇幅宏大的產業工藝講稿，可說是戰前極少數針對臺灣產業工藝展開的公開論述，特別是該文除了說明此行在臺灣的考察見聞，更透過山本鼎致力於農民美術運動及對產業工藝的見解，提出數項具體明確的建議。這篇洋洋灑灑分析臺灣產業工藝的文稿，至今仍是理解百年前臺灣工藝樣貌的重要參考。山本鼎依照製作目的及屬性，將工藝細分出產業工藝、

自用工藝及純粹工藝，他不僅明確論及被作為產業工藝要件的美術性，以及與經濟價值結合等問題，也特別強調純粹工藝存在的目的<sup>43</sup>。山本鼎眼中的臺灣工藝，最具潛力的是原住民族的工藝製作，反之對漢人工藝的發展採以停滯於未開幼稚等語彙形容，這點與1940年代來臺的柳宗悅，除了對原住民織品讚賞有加，對於漢人的竹工藝及供桌、陶瓷等活躍於生活日常的器物也讚賞有嘉的態度不同。是否漢人工藝在這一、二十年來的發展有所提升，或者是歸咎於山本鼎個人熟捻農村議題，對傳承於偏鄉仍保持相對原始氛圍的原住民工藝易產生共鳴。

山本鼎提出以複製的手法來加速產業工藝發展的可能，選擇原住民自用工藝品中精良作品為樣本，以原模樣、作法及選材為基準，加以複製生產作為臺灣土產品。如此一來過往僅能少量為自用製作的工藝品，得以產業性的被量化製造，山本鼎認為這樣推動也會間接把工藝技術給保存下來<sup>44</sup>。在產業工藝概念仍處起步之際，山本鼎在這場演講中，不斷以原住民基於生活需求製作的

<sup>38</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04月11日，5版。

<sup>3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04月16日，4版。

<sup>40</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04月20日，4版。

<sup>4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04月23日，4版；《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04月25日，4版；《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05月01日，7版。

<sup>4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05月05日，7版。

<sup>4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05月10日，3版。

<sup>44</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05月14日，2版。

自用工藝為基礎，透過製作可能耗費的時間、材料、價值，以及創作自由度等趨向來凸顯產業工藝的特徵。譬如在比喻這兩種工藝的差異時，山本鼎認為產業工藝「宜作成見本。導之依法製作。或擇內地向。或歐美向。各從適當之趣味。則自然及其處意匠圖案生焉。又既名為藩地產業工藝。則要帶有番地的色彩。用以鞏固販路。地方色之表出。為產業工藝重要之根據。故要不忘以在番地發達自用工藝為基調也。但用途過狹。過於單調。則宜廣參考同系統之手工藝級別種類之馬來系美術及工藝品<sup>45</sup>」。這段對產業工藝的說明，反映出山本鼎相當敏銳從銷售需求端來思考工藝生產的需求、供給兩面的問題，並且也認為工藝的用途可透過類似文化脈絡的其他作品參考，透過用途更多元的創造將可提升工藝的需求性。如此對產業工藝發展的理解及具體提出的策略，充分展現山本鼎貼近現實產業面的務實性策略作為。此行除了透過講演闡述所見所聞，同時也完成《臺灣的產業工藝》這本視察報告書，內容針對產業型生產機制有具體明確的論述，同時也呼籲創辦產業工藝學校的必要性<sup>46</sup>。

<sup>45</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05月29日，漢文5版。

<sup>46</sup> 山本鼎，《臺灣における産業工藝》，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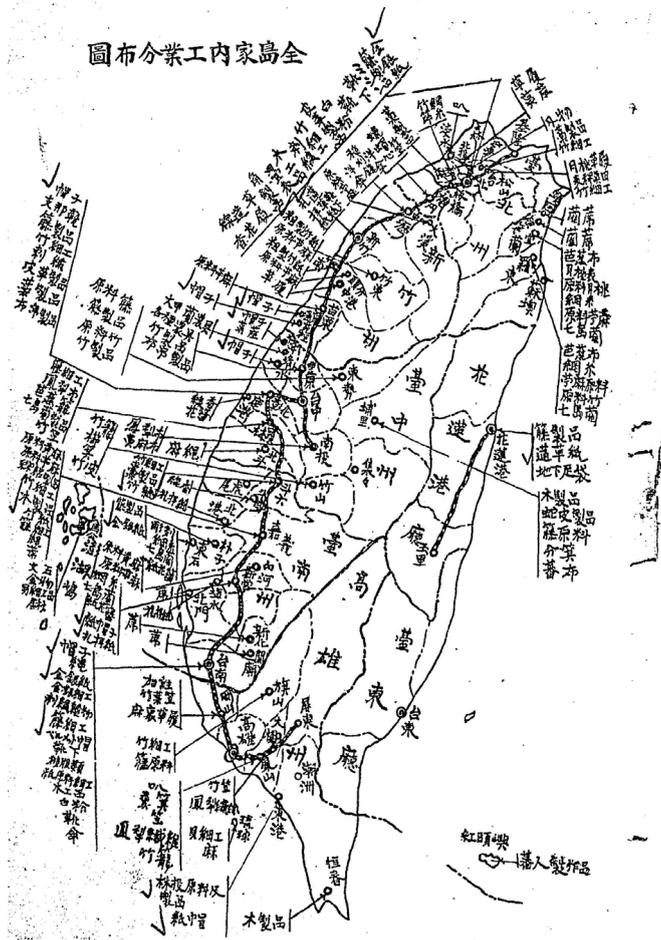


圖 2 《臺灣ニ於ケル家内工業》所附〈全島家内工業分布圖〉<sup>47</sup>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品陳列館於 1924 年 11 月與隔年 6 月，持續辦理展示會來推展業務，這兩次分別為化學工業展覽會、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會，產業工藝議題的存在感遠不如家內工業展覽會、副產獎勵展覽會當時的耀眼。只不過，《臺灣ニ於ケル家内工業》這份報告書的問世，以及《臺灣商品陳列館

報》機關刊物創刊，仍顯示商品展示館仍未減對產業工藝推動的付出。《臺灣的家内工業》的發行時間未有明確註記，根據報告書封面留下的寄藏標註及部分內容，推測應成書於昭和初期，出版的時間應與 1927 年發行的《臺灣商品陳列館報》相近。這本報告書內容由三個篇章構成，分別為一、臺灣家内工

<sup>47</sup>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品陳列館，《臺灣ニ於ケル家内工業》，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品陳列館，未註記。

業之發達。二、家內工業的全島分布狀況。三、臺灣的主要家內工業製品，不僅如此，在內文前還附有一張〈全島家內工業分布圖〉<sup>48</sup>。全篇以平實的文字紀錄描述當時臺灣產業工藝的發展狀態，對家內工業未能發達的原因等探究，多維持森忠平在1922年家內工業展覽會當時受訪提出的論調。這位從殖產局商品陳列館草創以來，長期任職該機關且積極主導產業工藝事務的森忠平，在1928轉任臺中州內務部勸業課及臺中州臺中州立物產陳列館<sup>49</sup>。至此以後，著力於產業工藝振興策略探究及政策宣達的重擔，幾乎落到商品陳列館另一位成員池部俊長（池邊俊長）囑託身上。

1920年代以來的日本，對工藝的認知從明治時期視為外銷主力的高級工藝品，開始出現如山本鼎提出的產業工藝、自用工藝及純粹工藝，或像是柳宗悅倡導的「民眾的工藝」，也就是今日以民藝聞名於世的工藝概念。在眾多探

索新興美感及製作目的等實踐浪潮下，工藝的概念及工藝存在的意義不斷地被論述演繹。其中，1926年創刊的《工藝時代》便提出「我們認為今日的工藝界若只孤注一擲地關注純粹工藝那絕對是不夠的，為了讓工藝能夠達到完全的發達，必須同步來振興產業工藝與自用工藝<sup>50</sup>」。這段話顯示產業工藝的重要性開始被留意，如此論調在同年組成的帝國工藝會及其刊物《帝國工藝》也反應出大正昭和之交工藝發展的時代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帝國工藝》第1卷5號收錄有池部俊長撰寫的〈地方工藝臺灣的工藝品〉一文<sup>51</sup>，這位任職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品陳列館的產業官僚，不僅將臺灣的工藝發展樣貌傳達至日本本土的工藝界，在1928年，池部俊長也計畫設立「臺灣工藝會」<sup>52</sup>這樣的組織。只不過這項對臺灣工藝發展意義深遠的事蹟，除了籌組當時有一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sup>53</sup>，以及池部俊長撰寫的〈商品と趣味（三）〉一文也略提此

<sup>48</sup>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品陳列館，《臺灣ニ於ケル家内工業》，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品陳列館，未註記。

<sup>49</sup>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昭和四年》，臺北：臺灣總督府，1929，頁366。

<sup>50</sup> 北原義雄編，《工藝時代》1：1，東京：アトリエ社，1926。

<sup>51</sup> 池部俊長，〈地方工藝 臺灣の工藝品〉，《帝國工藝》1：5，東京：帝國工藝會，1927。同刊另一篇的衫山壽榮男，〈臺灣蕃族の工藝〉，則是針對臺灣原住民的工藝發展所撰述的文章。

<sup>52</sup> 臺灣工藝會這項以工藝振興為目的的民間組織，在池部俊長為中心的局面下籌辦成立，該組織設立宗旨有四：第一是促進純粹工藝、日用工藝及臺灣獨特的產業工藝能夠興隆發展；第二希望發展具趣味且有實質益處的裝飾手工藝，藉此提升都會有閒暇女性的經濟收入；第三為研究創新具副業價值的貿易品，同時也提升一般商品的經濟價值；第四是改善普通教育中的手工學習，納入對日用工藝理解的內容。如此對工藝發展懷抱熱誠且提出兼具實務與理想目標的組織，即可能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工藝組織，可惜的是在臺灣工藝會創設的訊息在隆重問世後，就未再出現關於該組織實質後續的相關紀錄（《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02月26日，2版）。

<sup>5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02月26日，2版。

計畫之外，對這項組織的後續運作及實際作為皆未見後續。

幾乎在同一期間，日本中央部會商工省著手籌辦「工藝指導所」，聘請時任富山縣立工業實驗場長兼工藝學校長的國井喜太郎擔任首任所長，在配合東北地方振興國策下，於該年 11 月 30 日設置於仙臺並開始運作<sup>54</sup>。作為日本政府首創的國立工藝指導機關，創設目的在於解決明治時期以來，作為重要輸出品的高級工藝品發展衰弱，進而導致國內流通的工藝品質粗糙低劣等問題。為打造具實用性且廉價良質的產業工藝品來推展輸出產業，提振國內產業工藝與

地方工藝，針對輸出工藝的振興進行研究指導呼應了這座機構的發展目的<sup>55</sup>。

工藝指導所創設的隔年，機關刊物《工藝指導》創刊，著手推動傳習生制度及各項工藝振興措施，在 1930 年，開啟派遣海外工藝事情調查員前往各國考察的工作。到了 1932 年，發行《工芸 NEWS》這份戰前產業工藝領域重要的刊物，在前一年的二月，國井喜太郎所長受臺灣總督府以副業品藝匠圖案指導改善講習會講師之名義邀請前往臺灣，這項事蹟被收錄於〈工藝指導所二十年史表〉之內，為該年度四則大事記之一<sup>5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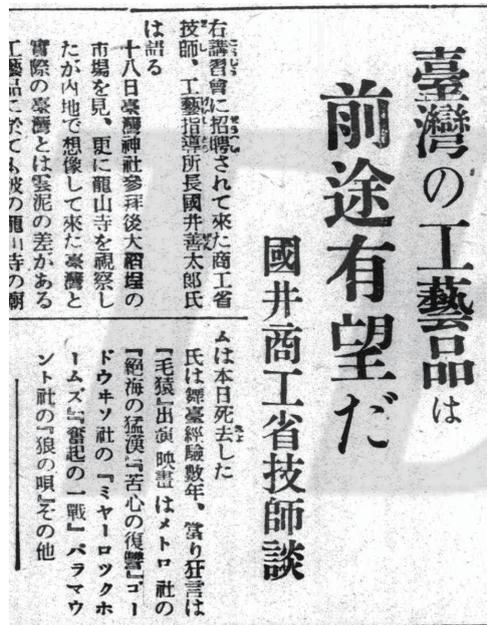


圖 3 國井喜太郎來臺評價臺灣工藝的報導<sup>57</sup>

<sup>54</sup> 商工省工藝指導所，〈工藝指導所研究抄錄〉，《工芸ニュース》17：2，1949，頁 15。

<sup>55</sup> 井上祐里，〈商工省工藝指導所と輸出工芸〉，《藝叢》30，2014，頁 45。

<sup>56</sup> 商工省工藝指導所，〈工藝指導所研究抄錄〉，《工芸ニュース》17：2，1949，頁 15。

<sup>57</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02 月 20 日，7 版。

西元1931年2月，頂著工藝品意匠圖案權威頭銜的國井喜太郎(1883-1967)，偕同另一位被譽為土產品製作與事業經驗第一人<sup>58</sup>的農林省囑託山中省二<sup>59</sup>，以協助臺灣總督府提升臺灣副業意匠圖案水準及事業經營為目的，首度踏上臺灣這塊土地。國井所長與山中囑託的訪臺行程，受到《臺灣日日新報》高度的關注，從首日前往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參拜，再轉往大稻埕、龍山寺等地視察遊歷的行蹤描述，同時以「臺灣工藝品前途有望 國井商工省技師談」如此令人充滿期待的標題，說明此行將從臺北、臺中一路巡迴到臺南辦理講習<sup>60</sup>。國井喜太郎提及臺灣有竹、木等豐富的材料，過往當局對工藝品缺乏熱心的指導，他將利用這些講授指導的機會來協助提升臺灣工藝品的品質<sup>61</sup>。

這次來臺的講習為期三週，20日擇商品陳列館舉行發會式，臺北場次的講習歷時5日，主辦單位臺灣總督府商工課利用結業當日的午後，召開「臺灣工業振興座談會」來針對：1、土產品為題，2、工藝品藝匠圖案問題，3、工藝品製

作問題，4、生產組織問題，5、授受改善問題，6、臺灣製品南華南洋進出問題等課題展開討論<sup>62</sup>。商工課長戶水昇於座談會開頭，提及臺灣總督府邀請工藝指導所所長國井喜太郎、農林省囑託山中省二訪臺，乃是希望透過這兩位的專業來改善作為臺灣副業的工藝美術品在發展上面臨到的問題。也因此，戶水課長特地利用講習會後的空暇邀集稅關鑑定官西村信一、刑務所長志豆機源太郎、臺北州產業主事小池金之助、編輯課囑託尾崎秀貞等政府官員，高商教授武內貞義、工業學校長瀧波惣之進、高校教授鹽月桃甫、師範學校囑託石川欽一郎等相關教師，以及盛進商行、日本蛇族研究所、生蕃屋、山一物產販賣所、臺灣物產紹介所、藤細工店、竹細工店、木工品店等商家與會<sup>63</sup>。

從這份出席名單顯示出總督府當局邀請國井喜太郎、山中省二來臺針對產業工藝的製作、銷售等層面策畫的指導講習活動的著眼，除了過往相關座談常見的官方及教育界的參與，實際從業者在本次座談及從臺北、臺中到臺南的巡

<sup>58</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02月27日，3版。

<sup>59</sup> 山中省二為時任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的弟弟，此行以農林省囑託暨日本產業協會囑託之銜隨國井喜太郎一同來臺。於3月13日離臺前短暫住宿於其兄的館長官舍。此行對臺灣的歷史、風俗及自然景致留下深刻印象，認為這些都是工藝製作可善用的材料，因當時所見的臺灣工藝完成度有所不足，期許能在地方色及高尚優美的原則下加以發展。(參照《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03月13日，夕刊2版。)

<sup>60</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02月27日，5版。

<sup>6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02月20日，7版；《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02月21日，漢文4版。

<sup>6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02月26日，漢文4版。

<sup>63</sup>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一)〉，《臺灣之產業組合》60，臺北：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31，頁16。

迴講習會都有熱絡的參與。另一方面，像是鹽月桃甫、石川欽一郎等具影響力的美術教育指導者，以及臺灣第一座現代工業學校：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校長瀧波惣之進的與會，也反映出總督府在產業工藝振興的推動也不忘美術、工業（工藝）教育的重要性。主辦單位戶水昇課長在座談會中也提及工藝教育的議題，雖然這項業務屬於文教局所管，但他仍透過自己家鄉石川縣的工業學校教學情形比起發展工業，實際上更重視工藝教育的發展方針為例來諮詢瀧波惣之進校長的看法。瀧波惣之進校長提及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在發展上確實也有類似的想法，只不過如果在臺灣推動這樣的教育將會造成畢業生不易找工作，也因此自然沒辦法發展工藝取向的教育<sup>64</sup>。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山中省二於座談會上也提到，臺灣已有充分的工藝製作能力，同時也有獨自的工業學校，這方面相似的機構在近期內大致沒有再增設的必要，反倒應該要朝向設置能活絡現有發展基礎的機關<sup>65</sup>。

時任臺北州產業主事的小池金之助站在地方官員的立場，也提出臺灣總督府可考慮設置工藝指導所，在地方政府

下設置工藝試驗所、或在中央研究所中增設工業部等作法來推動小規模的工藝振興輔導。並說道自己也試圖在臺北州預算中編列相關經費來推動，可惜屢次都因為財政或其他問題而未能實現<sup>66</sup>。受邀為這場座談會主發言者的國井喜太郎，正如商工課長戶水昇引言所述是當時日本政府唯一官營的工藝指導所之長。只不過，國井喜太郎在這場公開座談的發言，未將設置工藝指導所視為振興產業工藝最重要的工作，而是透過他最熟悉的意匠圖案面向來解析對臺灣工藝發展的觀察。國井喜太郎眼中的臺灣意匠圖飾是由原住民圖樣（生蕃模樣）與漢人圖樣（支那模樣）所構成，他認為唯有在地人才具備擅用在地事物的能力，就像日本人對日本的事物最能夠統整應用，南洋人對南洋事物最有辦法掌握處理。也就是說，當地人對該地的氣候、風俗及天然物等一切事物能夠自然地信手捻來應用，更相當用心投入的依循自己覺得有趣且希望嘗試的做法施作創造。但經常當地人對作品的價值都不太能掌握理解，反倒是他鄉或都市人卻能理解且感受這些作品的美感<sup>67</sup>。

原住民的服裝圖樣事實上與他們的

<sup>64</sup>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二）〉，《臺灣之產業組合》61，臺北：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31，頁32。

<sup>65</sup>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四）〉，《臺灣之產業組合》63，臺北：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32，頁59。

<sup>66</sup>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三）〉，《臺灣之產業組合》62，臺北：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31，頁32。

<sup>67</sup>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二）〉，《臺灣之產業組合》61，臺北：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31，頁23。

膚色相當調和，色彩被認為搭配得很理想。從中國傳來的圖樣與從中國傳來的事物，絕非偶然地傳來。與其說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樣的關係而造就從中國傳來這些事物，毋寧說這些事物就是臺灣的<sup>68</sup>。

透過前述的文字，顯示國井喜太郎相當重視文化發展的場域，著眼於人、環境、時空、技術、事物之間構成的有機連續性，他先以原住民服飾穿戴在原住民身上呈現的調和之美，敘說在地創作者憑藉仰賴與生俱來的技術及材料運用，創造出跟自我最協調的事物。另一方面，他以臺灣漢人文化與中國原鄉的關係為例，認為從中國傳入臺灣的事物，雖然文化根源來自中國，但是這些東西會傳來必有其因，能夠被臺灣接納且得以深根存在，早已能視為道地的臺灣產物。如此獨到的文化詮釋觀點，顯示出國井喜太郎對在地原創文化的推崇，他更直指「原住民圖樣與漢人圖樣這兩系統要好好的應用發揮，將有助於臺灣工藝品藝匠圖案有好的發展」。國井喜太郎認為只要妥善將臺灣特色的藝術應用在商品製作上，絕對不只是用來製作土產品，而是可發展成外銷輸出品，更深信不會成為欠缺商品價值的意

匠設計。除此之外，國井喜太郎也提到從臺灣的工藝品中感受到臺灣人手的靈巧，這點不僅表現於原住民的技藝，漢人的手藝更是細膩高超，讓人覺得有不少擁有好手藝的人都來到這個島嶼般。但是，過度追求精雕細琢的細工製作，經常被作為商品、作為實用品的價值就不高，他以日本與歐美為例說道，日本在細工製作的發展上相當蓬勃且成熟，不過在實用性這點的顯得不夠到位。反之歐美雖然精細的製作能力顯得不足，但是在器物的實用面向上就很不錯。

總的來說，以「臺灣工藝品前途有望」開啟臺灣工藝品振興指導的國井喜太郎，強調工藝應先重視實用性，再施以細工提升其美感，如此就生產製作上的見解透過座談會的說明，希望提供當時臺灣工藝物產振興措施來依循參考。他以工藝品、土產品、骨董品、美術品各自有其目的及特徵之說，強調工藝不同於追求雅趣的藝術，作為商品的工藝品最大的目標在於多量生產加以銷售<sup>69</sup>。同行的山中省二就針對土產品開發及銷售的議題，呼籲應該更活用臺灣的風物、風俗等傳統意象在製作上<sup>70</sup>，如此說法與國井朝太郎重視在地原創性的觀點呼應。另一方面，他提議可透過組

<sup>68</sup>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二）〉，《臺灣之產業組合》61，臺北：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31，頁23。

<sup>69</sup>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二）〉，《臺灣之產業組合》61，臺北：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31，頁26。

<sup>70</sup>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一）〉，《臺灣之產業組合》60，臺北：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31，頁19。

織審議會的方式，透過審查制度來提升臺灣工藝品的競爭力。同時可更積極送臺灣的作品到中央辦理的博覽會參展，也在臺灣當地辦理展覽會以促進交流。透過這些方式可提供商品的意匠及圖案檢視是否符合當下趨勢並尋求改良提升的途徑<sup>71</sup>。

座談會在兩位來自中央的工藝指導大員及各界出席者踴躍發言討論下落幕，《臺灣日日新報》於會後以相當的篇幅報導這場活動盛況<sup>72</sup>，除了例行刊登於的日文版，也在漢文版以「為本島工藝品發展宜設審查委員會」<sup>73</sup>標題報導這場座談的成果。標題所示的審查委員會籌組一事，出自山中省二的提議

<sup>74</sup>，這項產業工藝振興的構想，在隔年二月再度邀請國井喜太郎來臺時即將成案，臺灣總督府計畫在東京設立臺灣物產審議會，國井喜太郎在該年由臺灣總督府商工課籌畫的本島工藝振興座談會上<sup>75</sup>，針對審查會員必要的專業及分工及配套制度提出具體且正面的建議<sup>76</sup>。不過一方面，對於期待總督府多出補助金來振興產業工藝的訴求，國井喜太郎卻大聲疾呼工藝製作者應盡可能不仰賴官方補助金進行生產，補助經費造成的依賴心並不利於工藝品振興發展<sup>77</sup>。國井喜太郎兩度來臺針對臺灣工藝振興策略的建言及其效應，成為 1930 年代臺灣總督府當局推動產業工藝發展的重要

<sup>71</sup>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四）〉，《臺灣之產業組合》63，臺北：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32，頁 58。

<sup>7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02 月 27 日，3 版。

<sup>7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02 月 28 日，漢文 4 版。

<sup>74</sup> 山中省二與山本鼎原為舊識，山中省二不僅在 1931 年來臺前專程向山本鼎探詢臺灣相關資訊，在 1935 年所發行的《帝國工藝》9:2「農民工藝特集號」中，即發表〈農村美術更生の新氣運〉一文，針對農民美術付諸於整體產業工藝發展上的困難提出一連串的檢討來回應山本鼎的農民美術運動的推行方針。

<sup>75</sup> 配合國井喜太郎再次來臺的行程，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依照去年的做法，同樣選在商品陳列館辦理這場座談會。當年這場活動受邀與會的出席者有：殖產局長殖田俊吉、商工課長中田榮次郎及技師馬場宏景、臨時國勢調查部調查課原口竹次郎、稅關檢查課長西村信一、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移川子之藏、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武內貞義及坂田國助、刑務所長松井晟千代、工業學校長瀧波惣之進、尾崎秀真、臺北州產業主事小池金之助、殖產局特產課技手佐野鏗爾、臺北市役所勸業課長中村彌太郎等三十餘名官民。其中不僅商工課長新任，除了馬場宏景、武內貞義、瀧波惣之進、尾崎秀真、小池金之助等人去年也出席之外，其餘皆為新面孔（出席名單參照至《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02 月 24 日，夕刊 2 版及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昭和六年》臺北：臺灣總督府）。

<sup>76</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02 月 29 日，3 版。

<sup>77</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02 月 27 日，1 版。

依據<sup>78</sup>，殖產局長殖田俊吉在1931年2月辦理的第二回副業講習會會前訓辭中，強調要發展具臺灣特色的高級工藝，並舉大甲帽、大甲藺的草鞋來強調臺灣獨特性的商品具有的價值<sup>79</sup>。如此發言內容確實呼應國井喜太郎及中山省二訪臺時對臺灣工藝品振興的提議。在殖產局長訓辭的結尾，殖田局長以真切地口吻提請再度來臺的國井喜太郎及協同出席的中山正男囑託能儘管指導，反映出總督府當局在產業工藝振興措施上，高度仰賴及期待國井喜太郎代表的工藝指導所象徵的官方中央權威性。這點若對照1924年間以農民美術研究者的民間專家身分受邀來臺指導的山本鼎，從農民美術角度開啟的產業振興方向，顯示大正・昭和初期臺灣在這幾位指導者先後造訪引導的助力下，產業工藝振興的局面逐步展現出新的生機。

#### 四、臺灣的民藝胎動與柳宗悅訪臺後的民藝遺韻：兼論生活文化振興會

西元1936年10月，一篇名為〈新興勃發興起的民藝運動 探求健康之美〉的文稿被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sup>80</sup>，作者名為淺沼喜實(1906-1985)，他是民藝運動相關組織的民藝協會成員，也是位於東京銀座，肩負民藝品銷售流通的重要據點「東京TAKUMI(たくみ)工藝店」的店長<sup>81</sup>。這位出生於鳥取，戰前於偶然機會與著名的民藝運動家吉田璋也相逢，進而協助掌理東京TAKUMI工藝店，同時投身於鳥取市文化團體協議會、鳥取文藝懇話會等組織來推廣文化藝術的人物。為何會將這篇對民藝運動及其理論的書寫，直接投稿在臺灣當地的報刊，其背後的原因尚未明朗，筆者現階段可確認的是，這篇文

<sup>78</sup>除了1931、1932年以商工省工義指導所長國井喜太郎為首的副業品藝匠圖案指導改善講習及視察指導，在1932年末，著名畫家也是日本最早制定綜合標準色票的和田三造，利用來臺擔任臺展第6回審查委員的機會，出席殖產局召開的臺灣工藝品座談會。1938年8月，山本鼎與畫家山崎省三再度訪臺，停留期間出席臺灣美術工藝品與土產品座談會。然而，後兩者不僅停留短暫，實際對當時的產業工藝政策造就的影響也遠不足前者。(參照自《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1月1日，7版；《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09月29日，2版)

<sup>79</sup>《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02月24日，5版。

<sup>80</sup>《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0月17日，10版；《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0月20日，7版。

<sup>81</sup>淺沼喜實，《さすらい人の風籟》，鳥取：淺沼喜實遺稿集刊行會，1990，頁381-393；唐井清六，〈『青空』同人のこと(その2)淺沼喜實〉，《親和国文》35，兵庫：神戸親和女子大學，2000，頁131-133。

稿在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將民藝運動的事蹟及柳宗悅的民藝概念傳遞到臺灣的一週後，被視為民藝運動精神堡壘的日本民藝館隆重在東京駒澤開幕<sup>82</sup>。這是偶然的巧合，或是柳宗悅周邊的民藝同人為呼應日本民藝館開館，主動於報章媒體發文來推廣民藝的作為。暫且先這樣來看，〈新興勃發興起的民藝運動 探求健康之美〉一文，應是首篇刊登於臺灣的民藝文章。此篇分成上、下兩部分，接續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的「文藝」版面，上篇的文章一開頭以民藝是民眾的工藝這句話來破題，指出民眾的工藝是相對於貴族的、工藝美術的語彙概念，說明一般人日常生活所用的家具、餐具有及文具等物品都是民藝品。該篇第一段落相當簡潔、明快就柳宗悅創造的民藝語彙及概念展開說明，指出實用品、普通品是民藝重要的兩大特質，以用為本且容易取得是關鍵，在符合實用品及普通品的特質之下，民藝必須擁有相當的品質同時也是誠實製作下的產物。如此平易的口吻來論述民藝特質的行文，相當全面地柳宗悅建構的民藝概念加以詮釋表達。

在第一段落對民藝的定義及基礎概念的說明後，第二段落以「誠實的美感」為小標，列舉自然、安全、誠實、簡樸、兼顧等民藝品特色，再以當時社會環境

受階級文化、商業主義等因素影響，讓原本存在日常生活的事物變得粗惡，民藝運動的興起正是為創造平易、可親的美世界等描述構成「讓新運動抬頭」。最後一段落以「內外的民藝運動家」為題，提及在國外有拉斯金、莫里斯，在日本則由柳宗悅發起新的民藝運動，他走訪全國各地，發現隱藏在當地的民眾工藝品及現今仍延續生產的健全民藝品，進而以此來辦理展覽會加以推廣<sup>83</sup>。下篇延續著淺沼喜實對民藝特質、民藝運動的社會意義等內容，分成：「活用地方色」、「為實用的美」、「九州的陶瓷器等」、「大家、覺醒吧」等篇幅展開說明。關於地方色的話題在戰前，不論就工藝產業或是美術創作層面，都是相當受矚目的課題。淺沼喜實所述的地方色活用，在於強調甚多具地方色彩的技藝傳統都還存在著，如果只收集民藝品並辦理展覽的意義不大，真正的民藝運動應該是開拓一條振興地方工藝的新方向，指導各地的職人們善用技術來生產作品才是更有意義的事。他指出像陶瓷器、家具等並非為了追求美的器物都能長久使用，那些由製作者人熟練且彷彿無意識下所生產的，並非出自某位名家之手才是好東西。

此篇於文末前特別以九州陶器為例，說明過往作為日常用品，現今則順

<sup>82</sup> 柳宗悅，《柳宗悅全集 第二十二卷 下》，東京：筑摩書房，1992，頁 264；柳宗悅，《日本民藝館案內》，東京：日本民藝館，2004，頁 11。

<sup>8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0 月 17 日，10 版。

應世人需求來製作延續，強調民藝並非活在過去，而更應該重視當下是否符合社會需求而被生產。此外，為了將這樣的價值傳達散播給社會各界，民藝運動推崇量產的製作型態，雖然這必須克服複製模仿或商業主義等阻礙。然而，民藝的概念及其運動在目前僅被知識階級所理解，這種狀況是令人感到惋惜的<sup>84</sup>。這篇刊登於當時臺灣發行量最大報章的民藝專文，從字裡行間顯現作者淺沼喜實對柳宗悅主導的民藝運動及其闡述的民藝概念有充分的掌握，全篇用字遣詞平易好讀，並未直接節錄柳宗悅論民藝的原文，而是將民藝概念的幾項關鍵概念，以及民藝運動於當下遭逢的問題，藉由文字加以敘說。雖然這篇文稿的內容並無提及臺灣，單從內容研判應並非專為臺灣的讀者而寫，然而透過投稿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文藝版面，並於文章結尾提及民藝概念亟待普及到社會大眾的期許，顯示這篇文章力圖把陌生的「民藝」引進臺灣的用心。

「日本民藝館開設」的標題搭配著顯眼的日本民藝館全景照片，選在日本民藝館開館週年時刻，這篇報導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醒目的版面上。未具名作者的新聞照片及數行文字構成的圖說，述說柳宗悅以雜誌《工藝》作為推展日本民藝的中心，歷經苦心的耕耘下

完成這座日本最早設立的民藝館<sup>85</sup>。再引用柳宗悅創造的「民眾的工藝」一詞，說明透過民藝館達到啟迪民眾正確的審美感的目的，並說明照片上民藝館建築的風格及用材，最終介紹《工藝》70號當期的作者一覽，並附上「菊判布裝八六頁定價二圓五十錢東京是神田區淡路町二ノ七小口ビル日本民藝協會」等資訊。從這則報導自前頭說明到最後所附上的雜誌發行規格、頁數、價格、訂購處等刊物資訊，似乎就是一篇雜誌《工藝》的刊物介紹，不過細讀內容可見這則篇幅不長的報導，試圖透過最簡潔的文字來傳達民藝及民藝館的訊息。只不過，《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中介紹的70號，實際發行時間在將近一年前的1936年10月24日，該期特別號的主題是「日本民藝館」<sup>86</sup>，收錄柳宗悅〈民藝館的使命〉、和井寬次郎〈民藝館的生誕〉、外村吉之介〈日本民藝館的成立〉、柳悅孝〈期待的事物〉、棟方志功〈感謝〉、吉田璋也〈我所想的民藝館〉等文章。換言之，雖然形式上像是一篇對日本本地雜誌資訊的介紹，實際上是透過雜誌及民藝館落成等具體的事物，以《臺灣日日新報》的圖文為媒介，正面向臺灣社會傳遞真實的日本民藝訊息。

<sup>84</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0月20日，7版。

<sup>85</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0月30日，5版。

<sup>86</sup> 日本民藝協會編，《工藝》70，東京：日本民藝協會，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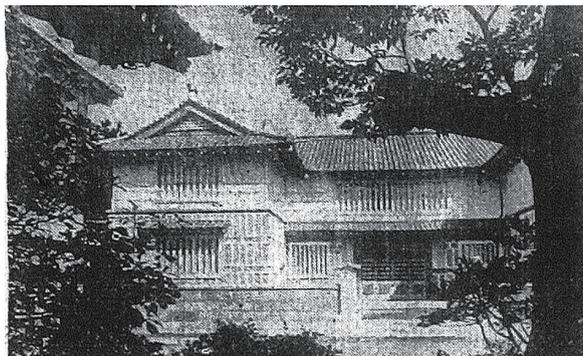


圖 4 1936 年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版面的日本民藝館開館景象



圖 5 日本民藝館現況（筆者攝）

不知是否受淺沼喜實及日本民藝館開設等報導播下的民藝種子啟蒙，在 1939 年底，高雄幾位文化人創辦「南方民藝協會」，希望以收集臺灣島內與南中國、南洋等國的民族藝術品，以及蒐集研究各地民話傳承為宗旨。在南方民藝協會創立的報導中指出，首先將從臺灣人的民話及信仰的源起與造就的民藝研究開始著手<sup>87</sup>，這裡採用「民藝」一詞的語意，對照該組織成立的目標及預期初步展開的研究工作範圍，字義可能側重流傳於民間或民族間的藝術表現。再從該組織事務所設置於山中登住處<sup>88</sup>，準備委員為橫山稻一、金子博、萬造寺龍

（山中登筆名）等陣容，可從這幾位戰前活躍南臺灣的活動事蹟，推測南方民藝協會所用的民藝之意應與柳宗悅倡導的民藝並非完全一致，但從該組織的命名及宗旨定位上仍流露出與當時民藝這項新概念發展相呼應之處。

在柳宗悅訪臺兩年前的時刻，一篇由屬名美術評論家的水澤澄夫（1905-1975）所撰〈民藝的新體制〉，共分成上中下篇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作者水澤澄夫與臺灣並無特殊的淵源，1931 年（昭和 6）從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美術專攻）畢業後，對柳宗悅的民藝運動產生共鳴，就在東京京橋

<sup>87</sup> 《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2 月 17 日，6 版。

<sup>88</sup> 山中登（1896-1979）為戰前活躍於南臺灣的文化人、民俗研究者，當時從事的職務及頭銜有皇民奉公會高雄州支部奉公委員、文化班主事、農商務省技手、高雄州商工獎勵館囑託、南方土俗研究會副會長、高雄州影戲協會長、皇民奉公會文化班囑託、臺灣畜產興業株式會社囑託、高雄新禮化聯盟常務委員長等。時任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長的山中樵及 1931 年協同工藝指導所長國井喜太郎來臺的農林省囑託山中省二為其兄，曾出版《旅の伝説玩具》（東京：旅行界發行所，1936）、《民俗信仰の玩具》（東京：書物展望社，1939）。並於 1941 年與金關丈夫、須藤利一、岡田謙、陳紹馨、黃得時聯名發表〈趣意書〉為雜誌《民俗臺灣》創辦發聲（參照至：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1934，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1934；《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5 月 5 日，4 版；石光生，〈山中登與臺灣皮影戲〉，《中國都市藝能研究》17，2018，頁 6-22）。

開設「諸國民藝商店」推廣民藝。這位甚早受民藝啟蒙的文化人，在1941年透過名為〈民藝的新體制〉的文稿，將自己對民藝運動的理解及想法傳達給臺灣社會。該文先回顧十餘年來柳宗悅引領民藝運動的發展事蹟，引用〈日本民藝館設趣意書〉完整內容，將民藝運動的原貌傳達給閱讀這份報刊的讀者。接著，說明解析柳宗悅透過出版、廣播、籌辦展覽會、座談會及技術指導等形式來推廣民藝，並認為這是大正至昭和年間規模最大的文化運動。水澤澄夫以第一人稱的語氣，說明民藝運動具有的獨創性，同時也對民藝對應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加以思索<sup>89</sup>。一方面，也透過自己跟民藝協會人士的對話，論及工藝的材料的問題、價格的問題、屬於日本傳統與否的問題，並且針對民藝之美過去根植於傳統，現在應該要產出可符合未來美感等議題加以論述。再者，也徵引柳宗悅於月刊『民藝』所發表的〈新體制與工藝美的問題〉一文，對機械與手工、個人主義、地方色及民藝的生產層面、消費面提出他個人的見解，同時也透過柳宗悅的言說來詮釋民藝<sup>90</sup>。到了文章最後的下篇，水澤澄夫分成：工藝教育的、地方色的保存、民藝必須要深入到各階層國民的生活之中三項議題，提到

若論及民藝的新體制，可更全面來思考工藝各項所面對的新體制問題<sup>91</sup>。整體來說，〈民藝的新體制〉的內容已從過往介紹日本民藝，深入到針對民藝諸面向的深究及詮釋。

從淺沼喜實談新興勃發的民藝運動，到水澤澄夫論民藝的新體制，以民藝為題的專論，開啟戰前臺灣的民藝知識論述，雖然這兩篇文稿內容應非專為臺灣讀者所寫，兩位作者也未親身投入臺灣的民藝考察及相關研究。然而在1943年柳宗悅訪臺之前，早先一步刊登於臺灣的報章媒體，讓當時正如火如荼在日本展開的柳宗悅民藝運動訊息同步傳入臺灣，對再探民藝運動與臺灣工藝振興來說別具意義。在水澤澄夫一文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的兩年後，柳宗悅一行到訪臺灣，展開全島的民藝考察，這項事蹟成為近年來回顧戰前臺灣工藝發展極具指標意義的大事。在這位來自於東京的民藝指導者走訪臺灣各地，並於訪臺期間出席臺灣總督府文教局主辦的民藝座談會，或是在當時的臺北帝國大學講堂、臺北公會堂等地暢談臺灣此行所感，公開展示此行蒐集的臺灣民藝品之餘<sup>92</sup>，究竟柳宗悅此行帶給臺灣什麼。我們先從訪臺後報紙所刊載的

<sup>89</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2月9日，3版。

<sup>90</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2月16日，3版。

<sup>91</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2月23日，3版。

<sup>92</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4月17日，3版；《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4月14日，2版。

〈保護強化本島民藝品〉報導內容<sup>93</sup>，來思索柳宗悅臺灣行對於臺灣的影響。該文以「空谷跫音」來形容柳宗悅訪臺期間於民藝座談會上的演講，強調民藝一詞並非譯自外文，直指民藝是國外所沒有的，民藝學是日本獨創的一門學問。再指出商工省近期也對柳宗悅的主張有所共鳴，將伸出援手來協助民藝館等相關事業。再把話鋒一轉，提及柳宗悅訪臺受到關廟的竹細工之美所感動，受到漢人與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工藝作

品所吸引。該報導描述將民藝品陳列展示讓人們重新認識其價值的重要方式，認為臺灣若能成立民藝館是很好的事情，或者直接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開闢一個民藝品展示部門，最後特別強調總督府傾聽著柳宗悅的高見，盼望此事能好好被考慮<sup>94</sup>。這篇未標示作者的報導深刻表現出對柳宗悅民藝的認同，並突顯臺灣總督府當局對柳宗悅訪臺的重視。



圖 6 柳宗悅訪臺回國前，於臺北公會堂舉辦蒐集工藝品的展覽會場<sup>95</sup>

關於柳宗悅訪臺引發的後續效應中，「生活文化振興會」的成立是最具代表性的，在當年六月一日的《興南新聞》篇幅，報導因應時代所需作為，在南進基地臺灣推動新生活的造形文化運動，進而成立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這項組織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長擔任會

長，理事名單包含總督府官員及金關丈夫、顏水龍、木下靜涯、辜振甫、鹽月善吉等民間人士。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的成立及規約辦法也隨後被登載在商工省工義指導所發行的《工藝 NEWS》第 12 卷第 5 號的「臺灣特輯」之中<sup>96</sup>。同年 10 月發行的《工藝 NEWS》第 12 卷

<sup>93</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4 月 23 日，2 版。

<sup>94</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4 月 23 日，2 版。

<sup>95</sup> 《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4 月 17 日，3 版。

<sup>96</sup> 商工省工藝指導所，〈臺灣の造型文化運動〉，《工藝ニュース》12：5，1943，頁 184。

第8號<sup>97</sup>，〈臺灣造型文化運動現況〉的報導持續被收錄在「產外工藝產業情報」專欄，指出從8月24日起，該組織從臺北前往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臺東及花蓮港各地辦理生活工藝座談會，針對組織設立的宗旨、戰爭時期國民生活用品與臺灣本地的工藝進行評論，同時也為十一月下旬預計開辦的展覽會交換意見。一方面，由皇民奉公會為中心所組成的美術奉工會也將十月份舉行決戰下的美術展覽會，預計在展覽中會設置雕刻部及工藝部。就在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處在官民合作氣氛下被推動，時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的工藤美好(1898-1992)，於《民俗臺灣》發表〈民藝論—特別是民藝與具有個性的天才藝術，以及與機械工業間的關係〉<sup>98</sup>。這位在帝大課堂講堂上教授英國文學，私下不僅懷抱著臺灣意識，與杜聰明、楊雲萍、吳濁流等臺籍文化人有深厚的交誼<sup>99</sup>，加上妹婿是活躍於文藝圈的畫家立石鐵臣，也因此，戰前眾多文藝活動皆可見工藤美好的身影。在這篇深入論述民藝闡揚其價值的文稿裡，一開頭針對柳宗悅訪臺的意義加以說明。

柳宗悅氏渡臺為臺灣民藝界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柳宗悅在臺灣的言說及實際的蒐集帶給住在臺灣島上的人們關於美的新啟示。至今為止住在臺灣的人們大多數對日常生活中的雜器相當不在意關心，柳宗悅為了大家而指出那些有時潛藏於日常周遭的器物，告訴我們那些含蓄內斂的美感並不比那些自覺很了不起的美感來得差。柳宗悅對於臺灣各方面加諸的印象及影響相當深鉅，期待這些具體的結果在今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展現<sup>100</sup>。

工藤好美也提及柳宗悅對關廟竹細工的推崇，強調民藝與生活，生活即為民藝是柳宗悅的終極關懷，認為這絕非只是出自柳宗悅個人的興趣，民藝本身是一項文化運動。他自述受到柳宗悅的影響而開始對民藝產生興趣，此文從民藝的歷史著手，沿著地方、鄉土、傳統等民藝發展的關鍵要素，運用他淵博的學識加以申論詮釋，內容甚少直接引用柳宗悅之說，而是掌握柳宗悅民藝的概念在延伸話題進行說明。作為一位英文學者，工藤好美文中探討天才、機械

<sup>97</sup>商工省工藝指導所，〈臺灣造型文化運動の現況〉，《工藝ニュース》12：8，1943，頁350。

<sup>98</sup>工藤好美，〈民藝論—特に民藝と、個性的天才の藝術と、機械工業との關係について—〉，《民俗臺灣》3：9，1943，頁2-14。

<sup>99</sup>工藤好美，〈臺灣文化賞と臺灣文學—特に濱田・西川・張文環の三氏について〉，《臺灣時報》279，1943；工藤好美，〈工藤好美所寄之明信片〉，《楊雲萍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42。

<sup>100</sup>工藤好美，〈民藝論—特に民藝と、個性的天才の藝術と、機械工業との關係について—〉，《民俗臺灣》3：9，1943，頁2。

等當代民藝發展遭逢的挑戰，信手拈來細膩地描述西方社會情境，或是就外來知識概念的背景補述也屢屢於論述中登場，可說是戰前出自臺灣在地最深入梳理詮釋民藝的一篇論著。被視為柳宗悅訪臺促成的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正好在工藤好美這篇民藝論發表前後，逐步在全臺各地展開活動。該年底，受雇於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鍊成課的泉清耀，發表〈生活與文化 — 一致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以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為副標題的這篇文章，一開頭即表露對該組織成立的期許，指出其成立的時空將面臨到文化疏離生活，以及戰爭期間不重視文化這兩難題，他分別提出己見強調生活文化的重要性。接著，介紹民藝或稱生活工藝的特質，認為民藝的美是撐起傳統的美感，是守護自然的美感，更是生活中孕育而生的美感。泉清耀就近代以來自由主義、自由思想導致的文化疏離為例，將民藝之美視為是為全體民眾生活所產生的美感，更以振興東洋民藝將可提升東洋人的生活品質，達到復興東洋精神之境。在此論調下，泉清耀將話題回歸到現實面，提及商工省所組織的大日本工藝會很重視日本民藝協會提出的地方民藝振興建言，正積極加以推動落實。

接著再度回憶當時臺灣的現況，指

出先前日本民藝館長柳宗悅來臺，造就臺灣對生活文化的反省急速高漲，在文教局長為首，結合數名有志之士為中心的誠摯努力下，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的成立令人充滿希望與期待。此篇最後以受較少近代文化洗禮的臺灣民藝在當今保存住優良的東洋傳統之說，強調臺灣存在就東洋傳統的復興或發揮東洋的力量都具其重要性，以此視為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須積極達成的使命<sup>101</sup>。隔年，泉清耀把自己與 K 先生（應是金關丈夫的化名）、文教局細野浩三視察北投窯場的過程書寫成篇，提到 K 先生相當熱情地向陶瓷業者說明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的宗旨及近期開展的展覽會，更闡述將為生活注入美感，建立健全美的王國如此宏願<sup>102</sup>。透過這篇文章描述及收錄的言說，顯示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直到 1944 年終戰前夕，在數名懷抱著熱誠的參與者推動下，依舊按規劃持續被推動著。再從 K 先生對生活與美的詮釋，以及泉清耀就民藝的行文所述所言，皆依稀可見柳宗悅民藝理論的影子。不久之後，臺灣總督府營繕課長大倉三郎與畫家立石鐵臣，也各自在《臺灣建築會誌》及《民俗臺灣》分頭發表介紹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的文章，這兩篇同樣提及柳宗悅訪臺的機緣，促使島內有識之士團結組織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

<sup>101</sup> 泉清耀，〈民藝論 — 特に民藝と、個性的天才の藝術と、機械工業との關係について —〉，《臺灣公論》8：12，1943，頁 88-91。

<sup>102</sup> 泉清耀，〈北投に窯業を見る〉，《臺灣公論》9：3，1944，頁 61。

大倉三郎將振興市井小民的造型視為首要，強調應好好重新看待身旁物品的造型與色彩，從中發掘臺灣的地方性、獨自性，把它作為東亞一區域的獨特文化來看待。此篇以「本島的造型文化運動」為主標，強調臺灣的生活工藝品不僅種類多、質地及地方特色都相當突出，大倉三郎一一細數臺灣生產的木工品、家具、竹製品、藤細工、纖維製品等類型，並以竹製品為例，強調臺灣竹細工強而有力的造型及健康風格，遠勝過講求優美纖細的日本技術指導。話雖如此，大倉三郎也自述並非蔑視日本文化，進而支持臺灣走向中國化，而是這場造型文化運動將可引領臺灣在身為日本一區域的立場下，妥善珍惜仍保留下的地方民藝傳統，加以對日本、對東亞的造形文化發展有所貢獻<sup>103</sup>。文章結尾前將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的設立趣意書、規約完整刊登，展現大倉三郎對該組織全力給予的支持及協助。立石鐵臣寫了一篇〈生活文化振興會覺書〉<sup>104</sup>，全篇如標題所示是以參與者的角度將該會的動態描述紀錄，立石鐵臣首先陳述在去年(1943)夏成立生活文化振興會後，為求11月能順利籌辦生活工藝展，便從8月起跟隨金關丈夫、文教局的細野浩三巡迴新竹、臺中、臺東、花蓮港

及臺北辦理座談會。這場展覽以推動簡約健全的造型生活為目的，希望可擺脫對日本本土的依存，活用臺灣本島生產的物品。立石鐵臣在說明中強調希望帶給一般民眾對日常用具「用與美」的健全認識，除此之外，從他的文章內容中可知當年這場活動主要的核心參與者是金關丈夫、大倉三郎、細野浩三及立石鐵臣，同時，身為該會成員的顏水龍也適時參加<sup>105</sup>。〈生活文化振興會覺書〉對於展覽籌辦過程、展品內容皆有詳盡說明，並指出在陳列展品的時候，感到有相當多的人對民藝品的解釋有誤，主導展覽企畫的立石鐵臣對展品的狀況多有疑慮，也對顏水龍設計製作出品的竹椅不甚滿意，雖行文帶著部分個人的情緒，但也生動的將生活文化振興會力求打造理想的生活工藝那份熱情與實務之間的落差表露無遺。

## 五、結論

關於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的運作報導，在立石鐵臣〈生活文化振興會覺書〉這篇問世後即未再有後續，就目前掌握的相關資料也未見相關的線索。推測除了時局條件對這場振興活動造成侷限，籌畫懷抱的理想在現實中實踐呈現明顯

<sup>103</sup> 大倉三郎，〈本島に於ける造形文化運動—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の発足〉，《臺灣建築會誌》16，1944，頁1-8。

<sup>104</sup> 立石鐵臣，〈生活文化振興會覺書〉，《民俗臺灣》4：4，1944。

<sup>105</sup> 立石鐵臣，〈生活文化振興會覺書〉，《民俗臺灣》4：4，1944，頁26-27。

落差，或許也加速戰前最後一波的工藝振興走向末路。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於設立宗旨中，將民藝視為端正生活文化發展的關鍵要素，反之對實際的工藝振興措施少有琢磨。只不過，這項戰前最具組織規模，參與者分布官民兩方的工藝振興運動，絕對是回顧戰前臺灣工藝振興不可忽視的一段。特別是促成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的重要契機，出自柳宗悅訪臺進行生活工藝考察造成的迴響，此行的動機不論出自東洋美術國際研究會與日本民藝館的委託<sup>106</sup>，或是從訪臺期間臺灣總督府當局主導策畫的座談會、演講及展覽等官方色彩的安排，柳宗悅仍維持著一貫立足於民間，以秉持專業良知與民藝推動使命感的日本民藝館長身分，於訪臺短短一個多月間極力為民藝運動的普及來奔走。話又說回來，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的籌組主要推動端為臺灣總督府文教局，會長也由文教局長西村高兄擔任，但是從泉清耀、立石鐵臣所留下的描述紀錄，以及《工藝 NEWS》<sup>107</sup>所刊登的相關報導內容，顯示在該會 20 位理事之中，有 6 位屬於民間人士。其中，以帝大教授身分參與其中的金關丈夫，任職臺北帝國大學

擁有正五勳四的官職位階，也身兼臺灣醫師試驗委員等要職，不過另一面的金關丈夫，是創辦雜誌《民俗臺灣》，透過各項文化活動表達對臺灣文化發展關切的知識分子，其秉持學術良知且對臺灣處境投以的關愛及付出，早已無法以單純的殖民地官僚來看待。

金關丈夫對於民藝運動的關注，以及在柳宗悅訪臺前後透過撰文發表對民藝議題的投入，具體展現於雜誌《民俗臺灣》的〈民藝解說〉專欄<sup>108</sup>。在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展開生活工藝展覽會、生活工藝座談會及島內生活工藝品調查蒐集等三大事業時，主要的執行者仍是金關丈夫偕同畫家立石鐵臣，還有同為理事的顏水龍<sup>109</sup>，再搭配擔任幹事一職的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囑託細野浩三做為主體。從這樣的核心執行者組成可見真正以官方身分參與的僅有細野浩三，藉此可再確認的是，日治時期臺灣工藝振興發展的各階段，絕非全然取決於官方絕對權力的政策主導。或者可以說官方在殖產興業、產業工藝、生活文化改善等國策驅使之中，另一股來自於民間的力量，果然也發揮相當的影響力，從日治時期最後一股工藝振興事業的臺灣生

<sup>106</sup> 柳宗悅，〈臺灣の生活用具について〉，《民藝》50，1943，頁 2；林承緯，〈柳宗悅與臺灣民藝〉，《文資學報》2，2006，頁 75。

<sup>107</sup> 商工省工藝指導所，〈臺灣の造型文化運動〉，《工藝ニュース》12：5，1943，頁 185。

<sup>108</sup> 關於金關丈夫與柳宗悅的私人情誼及對臺灣民藝研究及工藝發展投注的事蹟，可參照拙作：林承緯，〈從金關丈夫的民藝書寫看民藝運動對臺灣工藝研究萌芽的影響：以雜誌《民俗臺灣》之〈民藝解說〉為中心〉，《臺灣文獻》61：2，2010，頁 27-49。

<sup>109</sup> 立石鐵臣，〈生活文化振興會覺書〉，《民俗臺灣》4：4，1944，頁 26-27。

活文化振興會中即得到應證。再者，一路回溯到柳宗悅、國井喜太郎、山本鼎等當年宛如外來的和尚會唸經之姿，在不同時間點受邀來臺指導工藝振興，對臺灣工藝發展產生關鍵性影響的日本代表性工藝指導者，雖然國井喜太郎時任商工省工藝指導所長，然而技術官僚的專業背景與完全不具官方色彩的柳宗悅與山本鼎，這幾位宛如天降神兵般受臺灣總督府倚賴信任的指導者，確實對當時施政當局推動的工藝振興政策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

本論以通時性的歷史軸線，順著日本統治時期工藝發展的時空脈絡，盡可能運用各項工藝振興的一手史料加以研究分析，藉此重塑戰前臺灣工藝振興發展的基礎全貌。從工藝品振興、民藝啟蒙到生活文化振興的訂題，乃是這五十年間臺灣工藝發展各階段展露的特徵。從中，我們看到日治時期臺灣工藝的發展進程，絕非像是以往常以「殖產興業」一詞即足以含括這半世紀間的工藝狀態。論及日本統治五十年間的臺灣工藝，出自臺灣總督府配合國策、時局所推行的各項產業工藝措施，確實有相當的程度左右臺灣工藝各期發展的面貌。只不過，從1920年代，家內工業品展覽會、臺灣工藝品展覽會等相繼的登場，展覽、銷售、座談、講習及業界交流等措施，早已廣泛被運用於工藝振興環節。因應人們需求而生的工藝製作，往往在順應使用者需求及反應產地的物產條件下造就出個別的風格形貌，

在百年前統治當局所見的臺灣工藝發展樣貌，仍有相當程度表露著十八、九世紀以來漢人常民生活的情境及其特徵。諸如商品陳列館主任森忠平於家內工業品展覽前後，針對臺灣工藝振興提出己見，從當時身為殖產官員的口吻中，反映出當時產業政策並非僅止於單純地的利益導向，宛如插曲般由瑞穗公學校校長仿效農民藝術理念，創造學生們住校參與工藝製作，達到落實生活藝術化的作為，成為工藝品振興初期發展相當亮眼的一個事蹟。當時於日本本土推動的農民美術運動在山本鼎訪臺前，已透過其他的管道在臺灣東海岸一隅生根發展。

不久之後，農民美術研究者山本鼎來臺考察，商工省工藝指導所長國井喜太郎與農林省囑託山中省二也相繼來臺指導，這幾位在日本本土享有崇高盛譽的專家，各自走訪臺灣並透過視察、座談、講習、看展等各種形式為臺灣工藝振興開處方。臺灣總督府配合這幾位指導者提出的建言，也適時地調整工藝振興的作為，產業工藝的生產機制及產銷網絡的建置，可說是這時期奠定重要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山本鼎不具有官方的身分，國井喜太郎雖然身為商工省工藝指導所長，但兩次來臺身分及目的皆非工藝指導所的海外視察，而是受聘為總督府承辦的臺灣副產品講習會。特別是國井喜太郎於來臺期間，與臺灣當地產業界藉由座談交流互動，從至今鮮少被矚目的國井喜太郎的訪臺，

以及後續對於臺灣總督府工藝振興政策引起的變化，反映出在臺當局對於來自於中央具專業權威者的仰賴。縱使並無官方身分的山本鼎，或者國井喜太郎也非主要以商工省工業指導所長之姿到訪，不過一前一後兩位當紅的工藝指導者，有相當程度似乎凌駕總督府殖產局本位，引導走出一條在山本鼎、國井喜太郎建言基礎上發展而出的工藝振興策略。另一方面，此刻在日本如火如荼發展的日本民藝運動，也在淺沼喜實、水澤澄夫等人隔海將民藝書寫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將柳宗悅的民藝理論及民藝運動的事蹟介紹到臺灣，這波可稱為臺灣的民藝胎動期，彷彿像是柳宗悅訪臺的前置鋪陳。

西元 1943 年來臺考察生活工藝的柳宗悅，成為日治時期最後一位來臺影響工藝振興政策的指導者，訪臺期間到訪考察的產地，同行交流的金關丈夫、立石鐵臣、顏水龍等人，成為柳宗悅訪臺後，在激起生活工藝及文化革新風潮下，促成的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關鍵要角。雖然該組織籌畫出自於臺灣總督府文教局之手，但從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發起的展覽、座談及考察等具體事務的執行者，仍可見民間力量在這股工藝振興、生活振興機制下也有所發揮，甚至享有一定的主導性。日治時期臺灣工藝振興的路徑，若把它依序化約成工藝品振興、民藝啟蒙到生活文化振興，可看到振興這個統治者當局絞盡腦汁希望創造的可能，從土產品、副產品、工藝品、

產業工藝、生活工藝到生活文化，對象隨著不同的時空脈絡及歷年訪臺指導者加諸的建言及掀起的效應，臺灣工藝振興的發展並非僅是上到下的落實。在此期間，有臺灣工藝會的成立、有南方民藝協會的組成，有《民俗臺灣》的發刊，這些組織之間構成的人際網絡，事實上是另一股戰前推動工藝振興發展在民間的重要堡壘。藉此再考日治時期臺灣工藝振興發展的歷程，看似臺灣總督府強而有力領航掌舵下的殖民統治的工藝產業發展，在本論盡可能運用相關史料串起的論述及詮釋，讓這五十年環繞於工藝產業的人、事、時、地、物得以重新梳理綜整。百年前透過組織、展覽、銷售、講習、指導、改良等執行策略，官與民之間協作分工的工藝振興之道，今日仍在邁進重振的路途上，百年來的經驗積累如何轉化成今日推動工藝產業發展及文化振興重要的基石，猶待持續咀嚼歷史經驗開創更具未來取向的臺灣工藝新局。

## 參考文獻

- 人事興信所編，《人事興信錄 第12版》，東京：人事興信所，1940。
- 山本鼎，《臺灣における産業工藝》，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産局，1924。
- 大倉三郎，〈本島に於ける造形文化運動—臺灣生活文化振興會の発足〉，《臺灣建築會誌》16，1944。
- 山口真理・三橋俊雄・宮崎清，〈山本鼎の日本農民美術運動—大正・昭和前期における農村工芸振興の内発性に関する研究〉，《デザイン学研究》42：2，1995。
- 工藤好美，〈民藝論—特に民藝と、個性的天才の藝術と、機械工業との關係について—〉，《民俗臺灣》3：9，1943。
- 工藤好美，〈臺灣文化賞と臺灣文學—特に濱田・西川・張文環の三氏について〉，《臺灣時報》279，1943。
- 工藤好美，〈工藤好美所寄之明信片〉，《楊雲萍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42。
- 井上祐里，〈商工省工芸指導所と輸出工芸〉，《藝叢》30，2014。
- 天野朗子，〈臺灣の工芸と柳宗悦—柳宗悦の臺灣調査〉，《民芸》737。
- 立石鐵臣，〈生活文化振興會覺書〉，《民俗臺灣》4：4，1944。
- 日本民藝協會編，《工藝》70，東京：日本民藝協會，1936。
- 北原義雄編，《工藝時代》1：1，東京：アトリエ社，1926。
- 石光生，〈山中登與臺灣皮影戲〉，《中國都市藝能研究》17，2018。
- 池部俊長，〈地方工藝 臺灣の工芸品〉，《帝國工藝》1：5，東京：帝國工藝會，1927。
- 江韶瑩，〈臺灣工藝的發展與變遷 上〉，《臺灣美術》4：3，1992。
- 角南聰一郎，〈民芸運動と臺灣原住民の工芸—学説史及び集積された資料の整理に向けて—〉，《人類学研究所 研究論集》2，2015。
- 佚名，〈本島狀況〉，《臺灣商品陳列館報 創刊號》，臺北：臺灣總督府商品陳列館，1927。
-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一）〉，《臺灣之産業組合》60，臺北：臺灣産業組合協會，1931。
-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二）〉，《臺灣之産業組合》61，臺北：臺灣産業組合協會，1931。
-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三）〉，《臺灣之産業組合》62，臺北：臺灣産業組合協會，1931。

- 佚名，〈臺灣工藝品振興座談會(其の四)〉，《臺灣之產業組合》63，臺北：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32。
- 佚名，〈農村工藝特集号〉，《帝国工藝》9：2，1935。
- 佚名，〈柳宗悅氏臺灣民藝視察談〉，《科學の臺灣》11：2，1943。
- 東京高等工藝學校編，《松岡壽》，東京：松岡壽先生傳記編纂會，1941。
- 林文凱，〈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臺灣文獻》68：4，2017。
- 林承緯，〈柳宗悅與臺灣民藝〉，《文資學報》2，2006。
- 林承緯，〈顏水龍的臺灣工藝復興運動與柳宗悅—生活工藝運動之比較研究〉，《藝術評論》18，2008。
- 林承緯，〈臺灣における民芸運動の受容〉，《近代工藝運動とデザイン》（デザイン史フォーラム編），京都：思文閣出版社，2008。
- 林承緯，〈從金關丈夫的民藝書寫看民藝運動對臺灣工藝研究萌芽的影響：以雜誌《民俗臺灣》之〈民藝解說〉為中心〉，《臺灣文獻》61：2，2010。
- 阿部純一郎，〈戰時下臺灣における三つの「地方文化」構想—『民俗臺灣』と日本民芸協会の民芸保存活動を事例として—〉，《ソシオロジ》54：2，2009。
- 柳宗悅，〈失われんとする、朝鮮建築のために〉，《改造》9月號，1922。
- 柳宗悅，〈臺灣の生活用具について〉，《民藝》50，1943。
- 柳宗悅・金關丈夫・大倉三郎・中村哲・立石鐵臣，〈生活と民藝座談會—柳宗悅氏を囲んで—〉，《臺灣公論》8：6，1943。
- 柳宗悅，《柳宗悅全集 第六卷》，東京：筑摩書房，1981。
- 柳宗悅，《柳宗悅全集 第二十二卷 下》，東京：筑摩書房，1992。
- 柳宗悅，《日本民藝館案内》，東京：日本民藝館，2004。
- 泉清耀，〈民藝論—特に民藝と、個性的天才の藝術と、機械工業との關係について—〉，《臺灣公論》8：12，1943。
- 泉清耀，〈北投に窯業を見る〉，《臺灣公論》9：3，1944。
- 陳以凡，〈日治末期臺灣の工藝論述—《民俗臺灣》、柳宗悅與顏水龍〉，《現代美術雙月刊》160，2012。
- 翁徐得，〈中華民國工藝史〉，《中華民國發展史・教育與文化（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
- 唐井清六，〈『青空』同人のこと(その2)浅沼喜実〉，《親和国文》35，兵庫：神戸親和女子大學，2000。
- 商工省工藝指導所，〈臺灣の造型文化運動〉，《工藝ニュース》12：5，1943。

- 商工省工藝指導所，〈臺灣造形文化運動の現況〉，《工藝ニュース》12：8，1943。
- 商工省工藝指導所，〈工藝指導所研究抄録〉，《工藝ニュース》17：2，1949。
- 浅沼喜實，《さすらい人の風籟》，鳥取：浅沼喜實遺稿集刊行会，1990。
- 緒方康二，〈明治とデザイン——平山英三をめぐる〉，《デザイン理論》21，1982。
- 臺灣總督府殖産局商品陳列館，《臺灣ニ於ケル家内工業》，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産局商品陳列館，未註記。
-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昭和四年》，臺北：臺灣總督府，1929。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昭和六年》臺北：臺灣總督府，1931。
-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1934。
- 臺北市立美術館編，《走進公眾美化臺灣：顏水龍》，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12。
- 諸葛正，〈臺灣地方工藝史的脈絡與意義〉，《臺灣工藝》38，2010。
- 戴寶村，〈《臺灣文獻》與日治時代研究：研究史面向的考察〉，《臺灣文獻》59：2，2008。
- 顏水龍，〈臺灣の工藝産業に就いて〉，《工藝ニュース》12：5，1943。
- 顏水龍，《臺灣工藝》（復刻），南投：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2016。
- 藤田治彦，《現代デザイン論》，京都：昭和堂，1999。
- 《臺灣日日新報》
-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 The Revitalization of Crafts, Enlightenment in The Mingei (folk crafts), and Rejuvenation of Living Culture

Lin Cheng-wei\*

## Abstract

The 50-year period before the war marked a transition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afts in Taiwan. In the past, this part of history was described and understood as the colonization of people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by a colonial regime, which established an industrial mechanism for the tradition of crafts in Taiwan and absorbed resources for the profit of the empire. On one hand, it is commonly mentioned how policies, such as Japanization and assimilation, had an oppressive effect on Taiwan crafts. This has since been the accepted recor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crafts during Japanese rule. However, an open-minded examination of the period in this current social environment has altered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efore the war. The current discussions tend to focus on the attainment of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despite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emphasis on economic output.

It has now been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sinc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ended in Taiwan. However, behind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rafts industry, a significant background of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echnical cultivation, production, marketing mechanisms, and even measures for revitalization all originated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period. In Taiwan, research top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aft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all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In addition,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has recently come to light. The environment for a discourse on crafts history information has also matured. Drawing from historical archives on Taiwan's crafts industry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is study re-examines crafts development during that period, focusing on three stages of evolution: the

---

\*Professor and Dean, 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lincwlab@gmail.com )

revitalization of crafts, inspirations in folk art,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living culture. It started from the arrival of well-known, expert Japanese craftsmen in Taiwan, including Kanae Yamamoto, Kitaro Kunii, and Yanagi Muneyoshi, which prompted the Government-General to adjust their industrial policies based on expert guidance. Taiwan's craft revitaliz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guided by governmental and private efforts, gradually developed industrial aspects that connected with the society with exhibitions, marketing programs, forums and lectures.

**Keywords:** Taiwanese crafts, YANAGI Muneyoshi, Industrial crafts, Rejuvenation of Living Culture,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